

中图分类号：C913.7

学校代码：10856

学号：M030515131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动态老龄化视角下农村养老 支持系统研究

作者姓名：王洪围

指导教师：曾瑞明

专 业：社会保障

学 院：管理学院

申请学位：管理学硕士

完成时间：2018年3月

评阅人：

答辩委员会 主席：

成员：

University Code: 10856
Student ID: M030515131



RESEARCH ON RURAL AGED SUPPOR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AGING

Candidate: Wang Hongwei

Supervisor: Zeng Ruiming

Major: Social Security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P.R. China
March, 2018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递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动态老龄化视角下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研究

摘 要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存在是我国农村养老活动得以延续不断的重要原因，这一支持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其构成是怎样的，又是怎样运行的，在时代变革尤其是当前的快速老龄化冲击下农村养老支持系统是否是可持续的，如果是，它又是怎样调整来面对这些冲击？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首先探讨了农村养老支持运行的基础，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变迁的农村养老支持有着比较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政治上历朝历代统治者重视农村养老，经济上农业经济长期存在，文化上儒家注重伦理的孝文化仍存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这三者的稳定性决定了农村养老支持基础的稳定性。然后从农村养老的历史变迁出发，将我国农村养老史分为新中国成立前的传统养老支持演绎史和新中国成立后政策变迁下的农村养老变迁史两个部分，并着重探究了后者，在对历史变迁中寻找农村养老发展的基本规律。

从历史变迁中可以发现家庭与政府是农村养老供给的基本构成要素，而老年人则是农村养老需求的主体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农村养老支持供需模型。供给侧包括以家庭为核心的非正式支持系统和以政府为核心的正式支持系统；在需求侧包括老年人分层和基于需求差异不同的养老需求内容，供需双方相互作用最终达成农村养老支持平衡，现实表现为养老方式的选择。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着市场化和老龄化的不断冲击，市场化冲击已基本被化解，而老龄化冲击刚刚开始，在现有的老龄化理论基础上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并不足以使农村养老走出困境，这就需要将传统的静态老龄化转变为动态老龄化理论分析框架。

在动态老龄化理论框架下，农村养老支持系统需要进行新的调适。在总体上，“问题”思路向“适应”思路的转化；在供给侧，非正式养老支持以家庭为中心转向以老年人个人为中心，正式养老支持以政府为中心转变为以农村社区为中心；在需求侧，养老资源由养老支持供给侧单向流向养老资源需求侧转变为养老资源正向流动的同

时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可以反向传递给养老资源供给侧，实现养老支持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向互动。调适后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供给侧与需求侧相互作用形成新的平衡，寻找出一条在动态老龄化框架下的养老出路。

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深化了动态老龄化理论，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新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

研究发现，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脆弱性与坚韧性是矛盾统一的，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快速老龄化的冲击下，我国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可以通过自身与外界的互动调适持续下去。

关键词：动态老龄化，农村，养老支持系统，转型

RESEARCH ON RURAL AGED SUPPOR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AGING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rural endowment suppor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rural endowment activity in China continue uninterruptedly. What i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old-age support system, what is the composition of it, but also how to run, in the era of change, especially the current rapid aging under the impact of rural pension support system is sustainable, if so, how to face these shocks.

In order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rural old-age pension and focuses on the changes of the rural old-age support under the policy chang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t has experienced a relatively stabl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upport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rural. Based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ncient dynasty ruler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rural pension, the economic long-term exist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culture, Confucian ethics-oriented filial piety culture still exist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genes, the stability of these three determines the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support.

From the historical changes, we can find that the family and the government are the most basic elements of the rural old-age supply, and the elderly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rural pension demand, as the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ension supply and demand support system. In the supply side, the family as the core of the informal system and the government as the core of the formal support system; in the demand side, from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to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ern different needs of the elderly, supply and demand interaction eventually reached balanced performance of the way for the pension.

The impact of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impact of the market and the impact of aging, the first two shocks have been basically resolved, and the face of the ongoing impact of aging, in the existing theory of aging basis on the rural support system is not enough to make rural out of the plight of old age.

This requir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tatic aging into a dynamic aging

theory analysis framework.

Under the framework of dynamic aging theory, the rural old-age support system needs to be adjusted. On the whole si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ping" ideas to the "adaptation" ideas; in the supply side, the family changes and the government changes; in the demand side, the elderly pension mentality, pension content changes. After the adjustment of the rural support system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of the interaction to form a new balance, to find a dynamic aging in the framework of pension under way.

In the course of the research, the research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s used to deepen the theory of dynamic aging, and on this basis, a new rural old-age support system is constructe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vulnerability and tenacity of rural old-age support system is contradictory and unified, and it has tenacious vitality. Under the impact of rapid aging, Chinese rural old-age support system can be maintained through its own interac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KEY WORDS: dynamic aging, rural, system of the aged support, transformation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目的	3
1.1.3 研究意义	3
1.2 核心概念界定	4
1.2.1 动态老龄化	4
1.2.2 养老支持系统	4
1.3 文献综述	5
1.3.1 理论基础	5
1.3.2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相关文献回顾	8
1.3.3 研究述评	12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12
1.4.1 研究方法	12
1.4.2 研究思路	14
1.5 研究内容	14
第二章 农村养老支持历史变迁	18
2.1 传统养老支持的运行基础	18
2.1.1 “家国同构”的政治生态	18
2.1.2 “以农为本”的经济形态	19
2.1.3 “大家庭”的家庭结构	19
2.2 传统养老支持的历史演绎	20
2.2.1 传统养老支持的形成过程	20
2.2.2 对我国传统养老支持的评析	21
2.3 新中国成立后政策变迁下的农村养老支持	22
2.3.1 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养老支持	22
2.3.2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养老支持	24
2.4 本章小结	25

第三章 农村养老支持供需系统	26
3.1 个案调查下的农村养老支持的现实运行	26
3.1.1 个案调查概况	26
3.1.2 调查个案基本状况	26
3.1.3 对农村养老支持现实运作的评析.....	28
3.2 基于农村养老支持现实的供需模型构建	29
3.2.1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定义	30
3.2.2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构成要素.....	30
3.2.3 农村养老支持供需模型	30
3.3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供给侧	31
3.3.1 以家庭为中心的非正式支持.....	31
3.3.2 以政府为中心的正式支持	34
3.4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需求侧	38
3.4.1 老年群体的差异	38
3.4.2 老年人需求内容	39
3.5 本章小结	40
第四章 社会转型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冲击	42
4.1 市场化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冲击	42
4.1.1 市场化对农村养老非正式支持系统的冲击.....	42
4.1.2 市场化对农村养老正式支持系统的冲击.....	43
4.2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支持系统运行	43
4.2.1 老龄化下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供给侧.....	43
4.2.2 老龄化下农村养老支持系统需求侧.....	44
4.3 老龄化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动态冲击	45
4.3.1 老龄化发展态势	45
4.3.2 老龄化冲击的动态性	45
4.3.3 老龄化冲击对农村养老的影响.....	46
4.4 本章小结	47
第五章 应对思路：由静态到动态	48
5.1 老龄化理论的转变	48
5.1.1 老龄化理论的推进过程	48
5.1.2 传统的视角：静态老龄化	49
5.1.3 新的理论视角：动态老龄化.....	51

5.2 分析视角的转变	53
5.2.1 转变的原因：困境与出路	53
5.2.2 转变的路径：五大视野的扩展.....	55
5.2.3 转变的方向：三大方向	57
5.3 应对策略的转变	58
5.3.1 经验借鉴：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应对市场化.....	59
5.3.2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应对老龄化.....	60
5.4 本章小结	64
第六章 动态老龄化视角下的系统调适.....	65
6.1 调适的基础：动态系统论	65
6.1.1 动态老龄化的核心观点	65
6.1.2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特征	65
6.2 养老支持系统供给侧调适	66
6.2.1 非正式支持核心转变	66
6.2.2 正式支持核心转变	68
6.3 养老支持系统需求侧调适	68
6.3.1 信息资源的双向流动	68
6.3.2 老年群体的异质性	69
6.4 新的平衡	69
6.5 本章小结	70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71
参考文献.....	73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78
致谢	79

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1) 老龄化发展态势

一个国家或地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7%即被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一标准，中国在 2001 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①，截止 2016 年年底，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 10.8%，^②老龄化程度仍在不断加深。与此同时，2001 年到 2006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 7.1%上升到 7.9%，上升了 0.8%；而这一比重在 2011 年到 2016 年从 9.1%上升到 10.8%，上升了 1.7%，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老龄化速度也在加快。在 21 世纪我国还将面临由低龄老龄化到高龄老龄化的转变，“未富先老”的同时“未富快老”，我国的养老事业任重道远。

表 1-1 2001~2016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Tab.1-1 The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aged 65 and over in Chinese total population from 2001 to 2016

年份(年)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比重(%)	7.1	7.3	7.5	7.6	7.7	7.9	8.1	8.3
年份(年)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比重(%)	8.5	8.9	9.1	9.4	9.7	10.1	10.47	10.8

资料来源：根据 2011~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整理

(2) 农村养老供需矛盾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剧烈的社会转型给传统的农村养老支持带来巨大冲击。首

①资料来源：《2001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200801/200801000093949.shtml>。

②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先，不断推进的城镇化伴随着乡-城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失去劳动力基础，传统的子女养老面临困境，弱化了家庭的养老保障功能；其次，子女养老支持不足的农村老年人只能更多依赖于自身的劳动与储蓄以求自养，而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与储蓄不足以弥补子女养老的缺失部分；再次，由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国家将更多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社会保障投入，客观上对农村养老保障的投入有所欠缺。此外，随着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农村高龄人群也在不断增多，养老需求不断增长，同时对养老质量也提出更高要求。养老资源的供给不足与养老需求的不断上升使农村长期存在的养老平衡被打破，农村养老的可持续性备受考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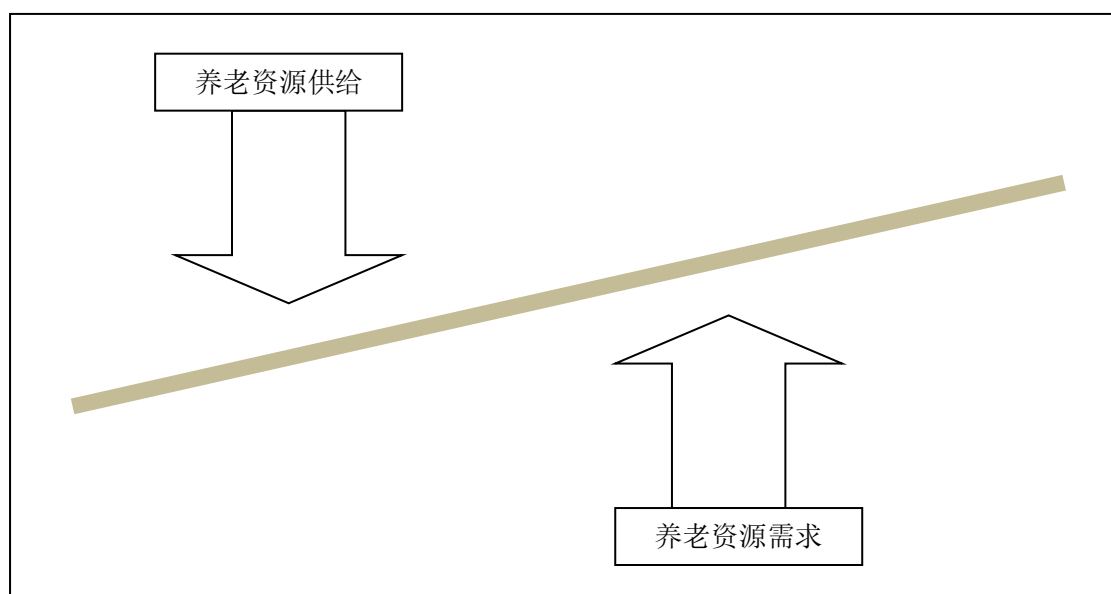


图 1-1 农村养老供需失衡图

Fig.1-1 The imbalance of rural pension supply and demand

(3) 社会保障体系构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①农村养老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 2016 年底我国仍有 42.6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社会保障的建设直接

^①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人社部发〔2016〕63号）。

关系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成败。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资金投入，从2002年开始的“新农合”试点到2009年“新农保”，从2014年决定合并“新农保”和“城居保”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到2016年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种制度进行整合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不到二十年时间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得以重建并逐步走向城乡接轨，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视。

1.1.2 研究目的

中国农村养老事业是怎样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得以支撑，它是怎样运行又是怎样面对时代的冲击，在快速老龄化的新形势下它是否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又将做怎样的调适？

本研究认为在中国农村养老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农村养老支持系统，这个系统坚守着农村养老的底线，也是农村养老持续千年的最坚实的力量。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这一系统的形成、构成、运行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它怎样应对现代化过程中的老龄化冲击。

在研究过程中，会对普遍关心的农村养老最终是走向社会还是回归家庭进行探讨，同时将始终围绕“怎样使农村老年人过得更好”这一终极理念。农村老年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他们也有过上更好生活的权利，在我国国力日益强大的今天，建立一个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发展成果人人共享，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

1.1.3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随着我国老龄化不断加深，老龄化研究也在不断推进，先后提出了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产出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老龄化理论。动态老龄化研究框架的完善可以丰富老龄化研究理论，扩展老龄化研究思路，从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待老龄化。

当前的农村养老研究过多集中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探讨，而农村的养老现实中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农村养老的贡献依然不大，正式养老支持制度之外的非正式支持才是当下农村养老的主要支持力量。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研究，试图寻求非正式养老

支持与正式养老支持实现合力的途径,实现农村养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将农村养老现实与理论相结合。

(2) 实践意义

当前农村养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也进入关键阶段。在此背景下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当代探讨有其必要性,在新的制度框架构建中寻找农村养老供需的平衡点,不仅可以减少农村养老资源供给的浪费,同时在农村养老政策制定过程中将农村养老支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通盘考虑,有利于减少农村养老风险,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速度。

1.2 核心概念界定

本研究是在动态老龄化视角下对我国农村养老支持系统进行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动态老龄化和养老支持系统。

1.2.1 动态老龄化

在国外已有动态老龄化相关研究,要用其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对其概念、理论、命题重新界定,以运用到中国农村的养老实际中。

动态老龄化指每个时代老年群体有着不同的特征,个体间差异也在不断变化,要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待老龄化。

动态老龄化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老年人群体是一个动态概念,“出生于不同时间的人,不可能以同一种方式变老”,由于社会变迁的影响,不同代际老年群体之间有着较大的异质性;二、同期老年群体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三,老龄化概念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这一概念也将随之社会互动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老年人才是决定什么是“老”的最佳发言人。^①

1.2.2 养老支持系统

本研究将养老支持定义为养老支持主体为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通过一定方式对其进行养老资源供给。养老支持按其来源可以分为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正式支持是指由国家或政府提供或干预的社会保障支持,非正式支持是指由亲属、邻居、朋

^①姚远,陈响.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理论框架构建研究[J].人口研究,2013,(02):73-82.

友等构成的群体对老年人提供的经济、劳务、精神方面的支持。^①

由于养老问题的复杂性,从单一角度看待养老问题难以真正理解和认识它,因此需要用系统的眼光去看待,养老支持的各方面相互作用形成养老支持系统。养老支持主体、养老支持客体和养老资源是这一系统最重要的部分,养老支持主体包括老年人个人、家庭、社区、政府和其他组织,养老支持客体为老年人群体,养老资源的内容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支持和精神慰藉支持。^②养老主体与养老客体的相互博弈形成各种养老方式,养老资源从养老支持主体流向养老支持客体,另一方面,养老支持客体的养老意愿也在反向影响着养老资源提供内容。资源与信息的双向流动不同于传统的将老年人视为被动的养老资源的接受者,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支持。

1.3 文献综述

1.3.1 理论基础

(1)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理论由拉什克提出,之后学者产生共识认为社会支持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它通过个人与他人进行社会资源互换形成,涉及行为、认知、情绪等一系列活动。^③这表明社会支持与社会交换密切相关。

社会支持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传入中国,最早应用于病理学研究,用来预防和治疗精神性疾病。肖水源认为国外的社会支持研究者对社会支持的概念理解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客观的,实际的或可见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其二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绪上的支持。^④对社会支持定义的分歧导致了对其评价内容的不一致,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如 Sarason 等的社会支持问卷(SSQ)^⑤、Andrews 关于城市社区健康研究的社会支持问卷和 Henderson 等人的社会相互关系调查表(ISSI)^⑥。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肖水源制定了包含实际的客观支持、

①姚远.重视非正式支持,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J].人口与经济,2002,(05):45-48+26.

②路瑜.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城市郊区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研究[D].南开大学,2014.

③陶裕春,申昱.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4,(03):3-14.

④肖水源,杨德森.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04):183-187.

⑤Sarason LG.et al. A technical report.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⑥Henderson S.et al. Neurosis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sted New Yorket: Acedemic Press 29-52.

对支持的主观体验和个体对支持的利用三个维度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①，这一量表仍是中国研究社会支持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量表。

此后国内学界对社会支持理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国内学者对社会支持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客观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是人们赖以满足他们社会、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家庭、朋友和社会机构的汇总；二是主观的支持，即个体所体验到的情感上的支持，也就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因而产生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②郑杭生、洪大用认为社会支持主要表现为各种社会资源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无偿帮助。^③李强认为社会支持应该被界定为一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轻心理应激反应，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④张文宏、阮丹青则认为“社会支持指人们从社会中获得到的、来自他人的各种帮助”^⑤，这也是当前学界比较广泛的共识。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社会支持理论也被广泛运用于多个学科和不同群体的分析。社会支持理论从病理学最先扩展到社会学研究，丘海雄认为广义的社会支持既涉及家庭内外的供养与维系，也涉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支持与帮助。社会支持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它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交换。^⑥李培林指出在经济转型中我国社会支持由单位向社区的转变，^⑦刘慧君、李树苗发现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支持对心理福利存在保护功能。^⑧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是研究的一大热点，如钱再见^⑨从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政策、社会支持工作模式来研究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此外张敏^⑩、秦俭¹¹、杨雄^①、唐晓容^②、邱海雄^③、韦璞^④分别以城市社区居民、农

①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02):98-100.

②陈成文,潘泽泉.论社会支持的社会学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06):25-31.

③郑杭生,洪大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J].社会学研究,1996,(01):58-63.

④李强.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J].天津社会科学,1998,(01):66-69.

⑤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J].社会学研究,1999,(03):14-19+22-26.

⑥丘海雄,陈健民,任焰.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J].社会学研究,1998,(04):33-39.

⑦李培林.社会生活支持网络: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J].江苏社会科学,2001,(01):53-55.

⑧刘慧君,李树苗.中国社会转型下的心理福利与社会支持[J].公共管理学报,2012,9(02):42-51+124.

⑨钱再见.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J].江海学刊,2002,(03):97-103.

⑩张敏.社会支持网络研究——对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7,(12):48-57+171-172.

11秦俭.农村独居老人养老困境及其化解之道——以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为分析视角[J].湖南社会科学,2013,(03):109-112.

村独居老人、青少年、孤残儿童、下岗职工、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对其社会支持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对社会支持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已经覆盖到了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研究,社会支持理论日趋成熟,将其运用于农村养老问题的分析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开展。

(2) 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网络理论起源于社会学家齐美尔于 1922 提出的“网络”概念,1940 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将这一概念发展为“社会网”概念,1954 年巴恩斯将形而上学的社会网概念转化为系统的研究,之后社会网络研究开始起步^⑤。这一领域的杰出研究成果包括科尔曼关于社会网对信息传播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和林南关于社会网与社会资源的关系、波特关于社会网的结构特征对个人观念形成和变化的影响、博尔特关于个体在社会网中的地位与它所拥有的权力大小的关系等。^⑥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指出,“中国的社会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村子通常是由一群家庭和家庭单位组成的,他们世代相传,永远居住在那里,每个农家既是社会单位,又是经济单位”。中国社会的本质一直是个网络社会。因此,尽管我国学者目前采用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学习西方理论而来,但早在此之前,中国本土学者已经对中国社会网络进行分析。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即“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关系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林耀华形象地指出,“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是像一个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⑦

①杨雄.弱势青少年生存状况与社会支持[J].社会科学,2004,(05):64-73.

②唐晓蓉.孤残儿童“类家长”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以南方 X 福利院内 12 个“类家庭”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4,(08):145-148.

③丘海雄,陈健民,任焰.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J].社会学研究,1998,(04):33-39.

④韦璞.贫困少数民族山区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J].南方人口,2007,(01):45-50.

⑤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1,(01):76-82.

⑥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J].社会学研究,1999,(02):110-120.

⑦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J].社会学研究,1999,(02):110-120.

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学系陆续恢复,林南到国内各高校讲学,直接推动了西方社会网络研究在我国的推广。阮丹青等通过对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的抽样调查表明,同美国人的讨论网相比,天津的规模更大,异质性更低,趋同性和同质性更高,紧密性更强,业缘关系的地位更重要,造成中美两国社会网差异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两国的社会结构根本不同。^①边艳杰、张文宏研究发现建国后各个时期中国的个人关系网络中强关系仍然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弱关系网络的解释力不强。^②

1.3.2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相关文献回顾

作为农村主流养老方式的家庭养老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迁移的结构性冲击下,养老功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新农保政策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无法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农村现行的养老方式面临着严峻挑战。^③

陈彩霞、陈功认为,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收益很低,放开人口流动限制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通过向城市流动获取相对较高的收益,土地对子女的吸引力很小,当前农村老年人不能通过土地的继承换取子女的供养。^④郭昕认为这一流动过程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了冲击,使得家庭权力结构逐渐分散,子女孝养的功利性增加,家庭养老经济保障变得脆弱。^⑤除了经济因素,还有文化因素。潘剑锋认为,传统的孝道遭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尊老养老观念淡化,长幼地位颠倒,不尽赡养义务和虐待老人,侵犯老人合法权益等,孝道在当前农村养老中功能弱化。^⑥此外,也有诸多政治因素不利于农村养老支持的可持续发展。陈少晖认为,在当前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民不仅要承受弱势产业的自然风险,还要面临与市民同等的市场风险,但我国政府在构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长期忽视使农村养老保障更加脆弱。^⑦李建新等人的研究表明政府需要在农村各类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中发挥主导作

①阮丹青,周路,布劳,魏昂德.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兼与美国社会网比较[J].中国社会科学,1990,(02):157-176.

②边艳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02):77-89+206.

③马红鸽.城市郊区农村居民家庭养老支持力系统的构建:以西安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6):136-142.

④陈彩霞,陈功.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对农村养老的影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1):171-176.

⑤郭昕.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的新问题[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65-67.

⑥潘剑锋.论孝道在我国农村养老中功能弱化的原因及其防范对策[J].湖南社会科学,2009,(03):59-62.

⑦陈少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4):35-41.

用。^①

学者研究表明,现阶段家庭养老在农村地区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由于受到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市场化、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的影响,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土地的作用不断下降,其文化根基孝文化不断弱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被不断削弱,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障长期责任缺失,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农村养老出现困境,迫切需要构建农村居民养老支持系统。

由于已有研究对农村养老支持的整合性不足,多从养老支持系统的某个方面开展研究,因此从涉及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养老主体、养老客体、养老方式和研究视角进行文献综述。

(1) 养老主体

家庭。对于家庭的养老功能主要从对家庭养老这种具体的养老方式的研究中体现出来。中国传统上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方式是由家庭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由于生产力限制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个人无法独自应对,需要家庭成员的分工合作,共同负担农业生产任务。同时家庭也是基本的消费单位,成员共享劳动成果,亲代年轻时创造出劳动成果抚育子代,子代在亲代年老时对其进行赡养责无旁贷。^②

农村社区。社区通常指人因为地域邻近而形成的集合体,农村社区在养老作用越来越大。社区合作组织对土地养老支持力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各地应因地制宜完善社区组织在养老等乡村公共事务中的功能。^③不同农村社区的养老支持资源存在较大差异,各社区地域特质、历史、常住人口数、文盲比重和经济状况对社区养老支持有显著影响。因此,在实践中应结合农村社区的差异来供给养老资源,以求更好地满足农村老年人需求。^④

政府。在农村养老这一多元化的行动者系统中,政府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我国政府正在从管理型政府向治理型政府转型,治理理论最重要内容是公共生活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的是多元主体之间信息权利责任义务

①李建新,于学军,王广州,刘鸿雁.中国农村养老意愿和养老方式的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4,(05):7-12+39.

②刘春梅,李录堂.农村家庭养老主体的角色定位及行为选择[J].农村经济,2013,(10):66-70.

③秦红增.农村土地养老支持力的村域比较[J].学术论坛,2010,(04):98-102.

④张丹.社区差异视角下的养老支持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4,(12):64-65.

的合理分配, 政府在其中起主导作用。^①农村养老事务是公共生活治理的重要内容, 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政府应该承担农村养老的道德引导、经济发展、法律构建责任。

(2) 老年群体

独生子女老人。原新认为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照顾问题没有以往研究中那么严重, 独生子女可以给予其父母基本的生活照顾。但是独生子女家庭是被简化到极至的高风险家庭结构, 这类家庭的老年人赡养应该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②

少数民族地区老人。王胜利、柯玲^③通过探讨宁夏农村回族老人的养老支持, 认为少数民族地区从道德和宗教两个角度对养老进行约束, 养老观念和养老方式更难改变。回民家庭中家坊结合的社区养老的方式将成为主要养老方式, 应整合家坊资源提高其养老质量。

老年妇女。徐勤认为农村女性老年人在经济来源等各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势使其晚年生活受到影响, 需要得到更多关注。^④佟新认为这种劣势将随着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不断扩大, 需要在经济和精神上给予她们更多支持, 重视老年妇女的家庭劳动, 保障其晚年生活。^⑤

(3) 养老方式

自我养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传统家庭保障方式不断弱化, 社会保障供给严重不足, 使得自我保障成了当前我国农村老年保障实践中的主要方式,^⑥朱劲松认为自我养老是农村养老模式的必然选择^⑦, 李俏、陈健研究发现农村土地自养、互助自养、储蓄自养和再就业自养是农村自我养老主要的实践类型。^⑧

家庭养老。家庭养老的支持力有四个维度: 孝文化规范力、财产(土地)吸引力、权威约束力和多子供养力。在这四种支持力的影响下, 家庭中的老人有着较强的养老

①周湘莲,刘英.论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的政府责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04):54-60.

②原新.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从人口学视角的分析[J].人口研究,2004,(05):48-54.

③王胜利,柯玲.农村回族养老支持网络分析——以宁夏南部山区为例[J].社科纵横,2015,(03):117-121.

④徐勤.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调查[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01):5-10.

⑤佟新.我国的老龄化、性别和养老政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82-89.

⑥黄闯.农村老人自我养老保障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探索,2015,(02):125-129.

⑦朱劲松.试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自我养老模式选择[J].农村经济,2009,(08):79-81.

⑧李俏,陈健.农村自我养老的研究进路与类型诠释:一个文献综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1):1-7.

资源的获取能力,家庭养老模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被延续和巩固下来。^①杜鹏等人认为尽管中国家庭正趋于核心化,但三代家庭仍是老年人家庭主要居住方式,这种居住方式随着老年人年龄的提高比例增加。^②柳玉芝等人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在生活照料方面仍主要依靠儿子或儿子的家人。^③郭志刚认为高龄老人对子女依赖有着强烈的性别偏好,没有儿子使其不能与后代共同居住的可能性加大。^④慈勤英认为传统家庭养老中依赖儿子养老的养老文化将随着子女数量的减少需要发生改变。^⑤

社区养老。社区养老是指在国家宏观指导和政策扶持下,以社区为依托,为满足日常生活自理有困难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顾需求而提供。学者认为社区养老包括“社区内照顾”和“由社区照顾”两种形式。“社区内照顾”是指社区在其提供的小型院舍或老年人住所内提供的照顾服务,而这些服务通常是由受薪的专业人士提供。由社区照顾则是指由家人、朋友、邻居及社区内志愿者所提供的照顾的养老服务。^⑥

机构养老。机构养老主要是指,在中央政府的倡导、组织、支持和资助下,大力动员社会各界各阶层各方面力量积极踊跃的建设社会福利机构及设施,并开展相应的社会福利服务,用来满足群众对社会福利服务的各种需求。目前我国学者对机构养老研究内容和切入角度多半是从社会福利社会化这一概念出发在宏观层面对我国机构养老的现状、模式和发展的探索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研究。^{⑦⑧}

(4) 研究视角

陈芳认为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重构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支持体系,需要结合各地成功经验,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整合家庭、社区、非政府组织和企业等各方面力量共同构建农村社会福利支持网络,才能解决好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⑨

阳杨、袁亚运基于社会网络视角,通过调查发现广场舞群体能够为参与广场舞老

①王冬桂.社会转型中的农村新型养老模型建构[D].山东大学,2007.

②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与养老服务的发展[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5,(07):27-28.

③柳玉芝,周云,郑真真.农村不同年龄人群养老观念的比较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4,(S1):150-153+179.

④郭志刚.中国老年妇女户居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1996,(05):45-53.

⑤慈勤英.家庭养老方式选择的性别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00,(02):29-32.

⑥徐擎擎,赵婧.我国城市养老方式文献综述[J].法制与社会,2009,(12):271-272.

⑦易松国,鄢盛明.养老院老人与居家老人健康状况比较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03):73-79+96.

⑧刘岚,陈功,郑晓瑛.我国社会化养老机构未来发展策略[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8,(04):412-414.

⑨陈芳.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农村留守老人社会支持体系的构建[J].理论导刊,2014,(08):82-84.

年人提供较多养老支持,自身条件较差的老年人在广场舞老年人网络中获得的养老支持更多。支持程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信息支持、情感支持、生活照料支持和经济支持。^①

1.3.3 研究述评

通过对以往农村养老支持相关文献的回顾发现,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探讨,从农村养老支持的必要性到养老支持多元主体再到不同养老支持客体的内部细分最后到养老方式,在研究的广度上不断扩展。当然已有研究也有不足之处:

首先,相关已有研究偏政策轻理论。偏重政策分析而忽视基础理论建构,这也导致农村养老支持政策不能长期稳定执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这些研究对农村养老支持的整合性不足。尽管在研究广度上不断扩展,但对于各个养老支持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相对较少,将农村养老支持整合成一个系统的研究更为匮乏。

再次,研究中“大养老”观念不足。现有相关文献有一半左右是对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分析,实际上,农村养老保险只是政府对农村养老支持中的一个部分,我国政府对养老支持职能分散在民政、社保、扶贫等多个职能部门。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当前我国农村养老支持的主要载体仍然是家庭,政府和社会对农村养老支持的资源供给占比依然很小。

针对已有研究的局限,本研究偏重对农村养老支持的基础理论分析,在农村养老支持历史演绎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整合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结合实际调研,分析我国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运行以及在快速老龄化中如何调适,将历史、现状与未来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1.4.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质化研究方面,通过对农村居民的个人访谈和农村养老案例补充更直观面对农村养老现实,同时运用历史研究法

^①阳杨,袁亚运. 社会网络视角下广场舞群体的养老支持研究——来自成都市调查数据[J]. 社会保障研究,2016,(02):36-44.

来研究农村养老支持的变迁；量化研究方面，通过对不同时代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1）个体访谈法

通过对 N 村及其周边几个村庄的 60 岁老人及其子女的访谈获取基层农村养老的现实情况。通过对现实中个例的直接接触，可以对农村养老现实的运行及其运行中的问题进行最直观的了解。

（2）历史研究法

通过对农村养老支持的历史梳理，探究其变化规律以及农村养老支持的基本构成要素。从农村养老支持的历史演绎变迁中可以找出我国农村养老支持持续运行的基础，可以寻找解决当前的农村养老问题的智慧。

（3）对比分析法

通过将当前的老年人与未来老年人在养老支持来源的选择对比，探究不同年代老年群体的养老支持的差异，说明随着时代的变迁，不同的老年群体的养老支持来源会发生变化。

1.4.2 研究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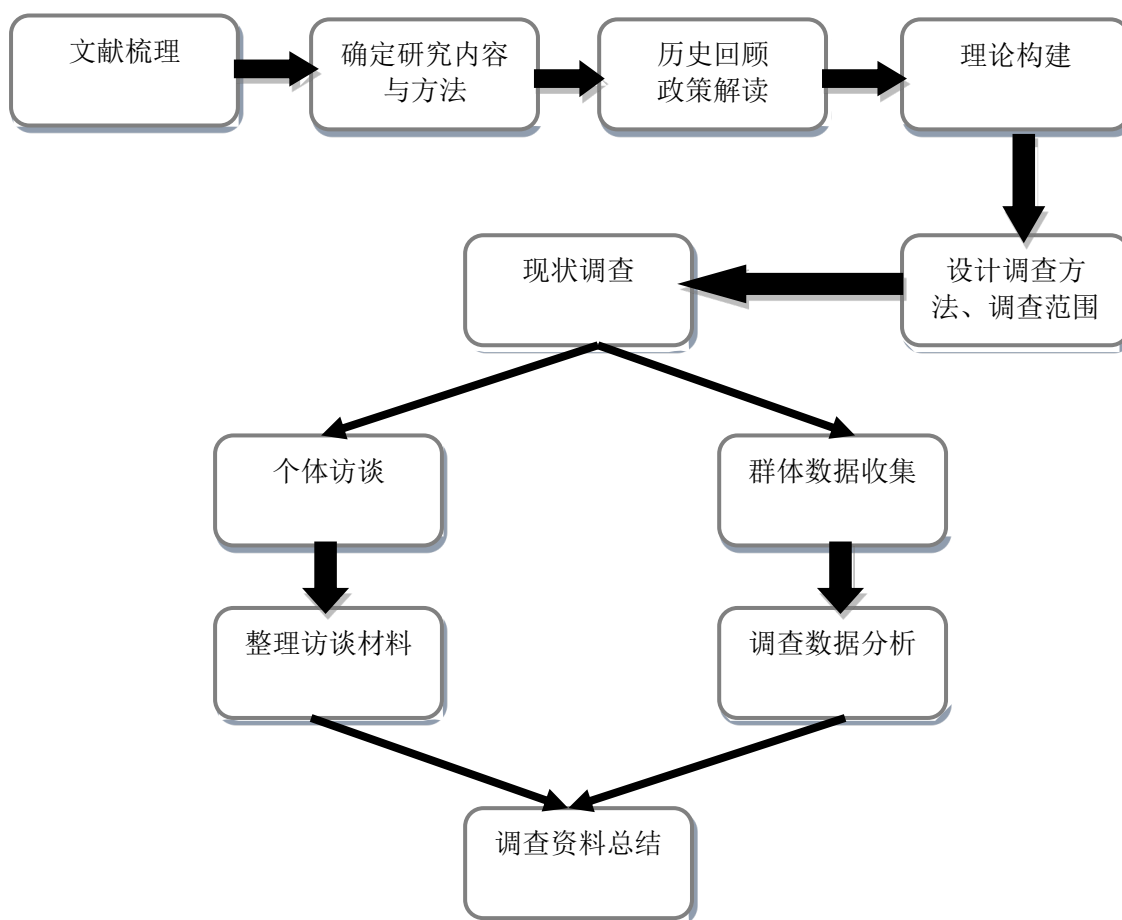


图 1-2 研究技术路线

Fig.1-2 The route of research technology

1.5 研究内容

本研究首先通过对当前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理论梳理，确定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然后归纳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稳定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上回溯传统农村养老支持的历史演绎，然后着重梳理建国后政策变迁下的农村养老支持变化，以此为基础初步构建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供需模型。在面对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化冲击采取的应对方法，可以为当下加速老龄化冲击下的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提供部分思路，但仍无法完全实现农村养老的平稳过渡，通过构架动态老龄化分析框架，从一

个全新视角去分析农村养老支持问题,在养老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双向变动中实现农村养老支持系统新的平衡。

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研究将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作为研究核心,研究的主体包括这一系统的演变历史与现实运行、养老支持系统供需模型、社会转型中的市场化与老龄化对这一系统的冲击与应对、老龄化下的系统调适四个部分。整个研究围绕研究核心分为七个章节,具体架构如下:

第一章绪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首先理清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说明研究的必要性。然后通过对核心概念“动态老龄化”与“养老支持系统”的初步界定和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相关文献梳理,找出前人研究的成果与不足,确定研究的核心与方向。最后确定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为整个研究确定研究框架。

第二章关于“农村养老支持历史变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首先归纳传统养老支持延续不断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这些因素对当前的农村养老的稳定性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农村养老支持的历史演绎进行回顾,从中寻找传统养老变迁的规律。然后分析建国后政策变迁下的农村养老支持变迁,包括建国初期、农业集体化时期、家庭联产承包时期、老农保时期和新农保时期五个阶段。传统的农村养老支持历史演绎中塑造了当代农村养老支持的“神”,即养老文化底蕴;建国后的农村养老支持变迁塑造了当代农村养老支持的“形”,即基本的架构。

第三章关于“农村养老支持供需系统”。在农村养老支持历史与现实基础上构建农村养老支持系统模型。这一模型是基于农村养老现实的理论抽象。这一模型包括供给侧和需求侧两部分,供给侧包括非正式养老支持与正式养老支持两部分,非正式养老支持包括个人、家庭、亲朋、邻里,以家庭为中心;正式养老支持包括政府、农村社区、市场力量,以政府为核心。需求侧主要包括老年群体差异和养老需求内容,因为不同群体的老年人的养老支持需求是不同的,需要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分层;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是主要的养老需求内容。在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相互作用下,系统保持平衡。然后对这一系统的特点进行概括,这一系统坚韧性与脆弱性并存,养老资源从供给侧单向流向需求侧。

第四章关于“社会转型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冲击”。本章主要考察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转型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冲击。第一部分考察市场化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造成的冲击;第二部分考察老龄化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影响以及快速老龄化背景下的

农村养老现实，描述当前农村养老支持的基本实际状况。在农村支持养老现实中，还存在着一些变化，如女儿养老的兴起、老年人自养的增多、政府的支持力度加大等。当前的老龄化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冲击将是持续的，这种持续性冲击需要我们调整应对思路。

第五章关于“应对思路:由静态到动态”。本章主要构建动态老龄化分析框架。首先从老龄化理论的推进过程中可以得出，老龄化理论并非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发展在不断自我更新，从传统的静态老龄化到动态老龄化转变，构建动态老龄化理论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包括概念、定义、核心理论。由静态老龄化向动态老龄化转变的关键是回归到关注老年人自身、关注老龄化本身，用适应视角代替问题视角。在新的老龄化分析框架下，从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应对市场化经验借鉴中，分析老龄化下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

第六章关于“动态老龄化视角下的系统调适”。在动态老龄化框架下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进行新的调适。在系统供给侧，实现两个中心的转移：正式支持系统的中心从政府向市场转移；非正式支持系统的中心由家庭向个人转移。在系统的需求侧，养老意愿反向传递给养老供给侧，养老支持系统中的养老资源与信息的流动由单向流动转变为双向流动，实现养老效用的最大化。

第七章是全文的总结与展望。首先对研究问题进行回答：农村养老支持是可持续的，在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可以通过系统的调适实现新的养老支持平衡。最后指出进一步研究方向，展望农村养老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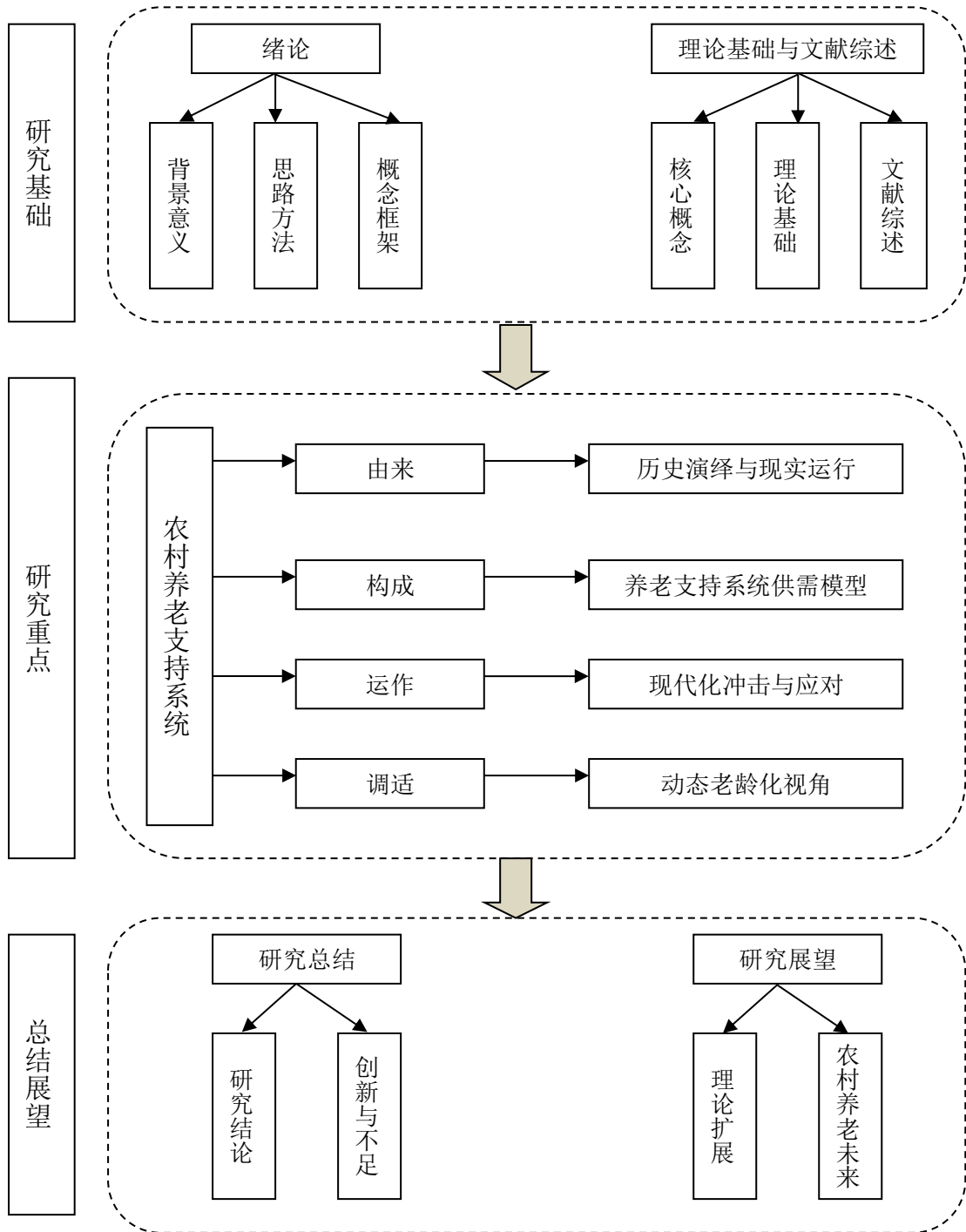


图 1-3 研究框架

Fig.1-3 Research framework

第二章 农村养老支持历史变迁

作为一个长期以农业立国的国家，中国有着丰富的农村养老实践。养老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成体例的养老规范，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养老文化不断发展，并影响至今。本章在对我国传统养老的基础分析和历史考察之上，着重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政策变迁下的农村养老支持，为我国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当代重构奠定基础。

2.1 传统养老支持的运行基础

中国的传统养老开始于原始社会末期，是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以农为本的政策之下，传统养老文化与农耕文明形成天然的良性互动，也正是由于这种良性互动，中国传统的养老支持才会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平稳运行，本节将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归纳传统养老支持运行的基础。

2.1.1 “家国同构”的政治生态

所谓家国同构，就是“国的统治秩序是家的伦理秩序的推广，国内部成员关系是家内部成员关系的推广；国与家是同构的，君臣间的政治关系与父子间的伦理关系也是同构的”^①。国是家的国，家是国的家这一概念最直白的表达。传统养老支持的稳定运行与历朝历代不断强化“家国同构”这一传统政治方式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首先，“家国同构”作为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弥补了传统社会中低层的民众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之间的距离感，提高了国家意志向下传递的通达性。家国同构在个人与国家建立了一条类似血缘的纽带。为了强调统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国家层面强调臣子对统治者的忠，在家庭层面自然会强调子代对父代的孝。“家国同构”下的忠孝一体是传统养老支持得以延续的政治基础。

另一方面，“家国同构”为普通民众提供了规范性。典型的例子是传统社会的家规，它有着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属性，是国家法律在家层面上的直接体现。正如国家法

^①岳精柱. “家国同构”下家规家训与“圣谕”的相互表达[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7, (03): 61-65+143.

律给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家规同样赋予了家庭中长辈的绝对权力，这种绝对权力保障了家长的权威，养老活动也由伦理转变为一种规范。

2.1.2 “以农为本”的经济形态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核心是土地，围绕土地而成的农耕文明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国，唯农是务”^①，《三国志》中的这句话指出了土地对于普通民众的重要性。孔子的“治国有礼，而农为本”^②更将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的根本。传统社会中农业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受到统治者重视，维持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也符合以最高统治者为代表的大地主的利益，因此这种经济形态受到统治者的维护。

在这种以农为本的经济形态下，土地的控制者有着更大的话语权，在家庭内部土地通常掌控在作为家长的老年人手里。老年人可以根据子女（通常是儿子）的孝顺程度决定未来土地的分配，这种经济约束力使得子女对老人的孝养成为一种未来对土地分配权的交换。

2.1.3 “大家庭”的家庭结构

中国传统养老长期以家庭养老为主，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中呈现出“反馈模式”，而西方社会呈现出“接力模式”^③。“反馈模式”即在子女幼年时，由父母抚养；而父母年老时，由子女来赡养，子女成为父母养老责任的最终承担者，这种双向式的养老方式影响至今。它的延续需要多子女来保障，“多子多福”正是“反馈模式”下的理性选择。我国唐贞观十三年为户均人口为 4.31，天宝元年为 5.75，金大定二十七年为 6.38，明昌元年为 6.55，明昌六年为 6.71，泰和七年为 6.36，元代为 4.48^④。较多的家庭人口数保证了养老资源的有效供给，降低了养老风险。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决定了中国农民可以通过农业生产获取绝大部分生活资料，没有发展商业贸易的动力，自然不需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再加上交通技术的落后，

① 引自：《群书治要·三国志》。

② 引自：《孔子家语》。

③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 (03): 7-16.

④ 转引自：吴松弟著, 中国人口史 第三卷 辽宋金元时期,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01): 155.

大大限制了人口流动,使得子女可以留在身边,低流动性也保障了养老劳动力资源的稳定供给。

2.2 传统养老支持的历史演绎

本研究所探讨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中的“农村”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制下与“城市”相对应的概念,并非指中国传统社会中因农业文明而形成的“村落”概念。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中现行的养老制度、文化与规范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演变形成,当前诸多的养老行为与养老文化密切相关,因此需首先考察我国历史上的养老支持演变脉络,以便分析当前的农村养老的运行逻辑。

2.2.1 传统养老支持的形成过程

我国的养老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经过夏商的发展,在周朝有了养老的基本规范规制。《礼记·王制》记载:“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飧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①”

《礼记·乡饮酒义》中记载:“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②”可以看出我国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一整套基于年龄的从地方到中央的相当精细化的养老制度。《礼记·乡饮酒义》还记载:“民知尊长养老而后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西周以宗法制作为其统治的政治基础,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养老制度的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国家安定,维护统治,这也是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重视养老的根本原因。

秦朝设置“乡三老”,汉高祖在此基础上设“县三老”,《汉书·高帝纪上》云:“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汉朝的“三老掌教化”,同时在乡举里选的察举制中向上推举人才起着关键作用,三老还可以享受免除徭役、接受皇帝分赐。汉代的老人还享有“赐王杖”、“行驰道旁道”的特殊政治礼遇。持王仗者可以与当地的地方官员平起平坐,驰道是天子专用道,汉代从经济上到政治上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①资料来源:《礼记·王制》。

^②资料来源:《礼记·乡饮酒义》。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期与衰落期，在盛世时国家的荒政对民间社会救济起着极大作用，而在国力衰弱时民间的救济力量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救济的不足。国家救济与民间救济的此消彼长是这一时期对民间养老支持的重要特征。我国商业经济在明清时期开始出现，它冲击了传统的地主土地经济，作为大地主代表的皇权被削弱，民间经济力量崛起，通过商业经济富裕起来的商业精英往往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实践者。这使得正式政府支持之外，民间的养老支持力量的崛起有了经济基础，尤其在饥荒年份和朝代更迭之际，中央政府对基层农民的救助往往是缺位的，此时地方商业精英对普通民众承担了包括养老在内的一系列救助活动。

2.2.2 对我国传统养老支持的评析

(1) 传统养老支持面临巨大风险

自然因素方面，长期以来农业一直是农民的最主要收入来源，而靠天吃饭是农业生产不得不面临的现实，一旦发生旱涝灾害，大面积的饥荒随之而来，养老支持的经济来源被切断。社会因素方面，首先在政治上，赋税政策直接影响农业收入，封建社会中皇权至上的专制决定了其制定政策的随意性。每个朝代前期的君主会通过“轻徭薄赋”的政策使农业生产活动持续下去，而盛世之后则会加重剥削，农民的生活日益困顿，养老投入也随之下降；经济上，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土地兼并，由于生产率低下且受剥削严重，小自耕农的土地往往被兼并，沦为雇农，甚至自身也成为大地主的私人财产，养老保障更无从谈起。

(2) 政府在传统养老支持中起着重要作用

传统的政府在养老支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为了维护政权，统治者必须保证基层民众的基本生活，这使得其有动力制定一系列政策来减轻赋税，限制土地兼并，客观上为农民保留了更多可用的养老资源；其次，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封建社会从上至下建立起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制度，子代对亲代的绝对服从与民众对君主的绝对服从是一体的，前者即为“孝”，后者即为“忠”，历代对忠孝一体的维护使得孝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基本的文化认同，封建政府通过立法奖惩强化了这一文化认同。

(3) 传统养老支持是一种最基本的养老支持

无论史料记载中封建王朝时期老年人受到怎样的优待与重视，必须明确的是，这

一时期对老年人的养老支持是低水平、覆盖面窄的支持，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绝不能与当前老年人的生活水平相提并论。首先，用历史的眼光去看，这一时期的生产力低下，产出水平低，总产出不足以支撑较高的养老水平，只能满足一种基本的养老支持。其次，这一时期阶级等级明显，统治者奢侈的生活必定是建立在对普通民众的剥削之上的，因此进入统治阶层的人可以得到相对较好的养老支持，而这只是极少一部分人，占比更大的普通民众的养老乃至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在天灾严重的年份，流民往往导致社会动荡甚至王朝更迭，维护统治是封建统治者尽力保障基本养老支持和民众基本生活的根本原因。此外，封建统治下的民众在长期的畸形封建教化下，普通民众能够满足基本生活对统治者就会感恩戴德，即使在“康乾盛世”时期，北方地区除去成本和社会储备，人均拥有粮食每月不足 24 市斤，“田收仅仅足民间八月之食”^①，普通民众的贫困可见一斑。在此基础上的传统养老支持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的基本养老支持。

2.3 新中国成立后政策变迁下的农村养老支持

2.3.1 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养老支持

(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养老支持

中国传统社会里乡村相对于国家统治具有独立性，即“皇权不下县”^②，而民国时期国家权力的向下延伸并不成功，这就造成了建国前乡村的养老保障基本全部由家庭或家族承担。与之不同的是，共产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而更加重视也更有经验去改造农村。从 1950 年到 1953 年除少数地区外全国完成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为家庭养老提供了物质基础。

此时农村家庭组织仍然延续了传统的多代人共同居住的大家庭组织形式。郭丽萍对北大历史系同学 1987 年对全国 26 个省 31 个县农村文化习俗的调查资料整理分析得出从建国到合作化时期，我国农村家庭两代人共居家庭占调查总数的 35%，三代人

^①孙兵. 人口、盛世与民生:对于清前期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2):245-250.

^②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共居家庭占 39%，户均 10 人。^①

这种几代人共居的大家庭往往由年长者充当家长角色，家长掌握家庭内各种资源的分配大权，有助于保障老年人的养老权利；大家庭人口众多，为养老提供了坚实的劳动力基础；多代共居也使得赡养老人得到更好的监督，并使良好的养老文化得以传承。

(2) 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养老支持

土地改革后，从 1953 年开始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形式，对农业逐步进行集体化改造，1958 年下半年 90.4% 的农户加入人民公社，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集体化。^②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农村养老保障面临着冲击和转变。

首先，人民公社制度严重削弱了农村家庭养老。人民公社将生产资料公有化，实行供给分配制，家庭不再拥有剩余农产品，使家庭养老失去了经济基础；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打击了传统的家庭组织方式，使家庭养老赖以生存的组织基础被破坏。^③

其次，人民公社打击了传统的宗族养老力量。宗族长期以来一直是家庭之外最重要的农村养老力量。传统的宗族以血缘为联系纽带，而人民公社时期以地域作为生产队的组织依据，这就将人们的宗族意识大大淡化。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将宗族文化作为一种封建残余文化进行打击，宗族被不断削弱，其最初承担的养老功能也不断消失。

在传统家庭养老受到打击的同时，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养老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比如农村五保制度的确立。党和政府在建国之初就很重视对贫困农民的政策支持，1956 年 6 月通过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农业合作社对于缺乏劳动力或者完全丧失劳动力、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在生产上和生活水平给以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保证他们的吃、穿和柴火的供应，保证年幼的受到教育和年老的死后安葬，使他们的生养死葬都有依靠。”^④这一规定确立了中国的五保

①郭丽萍.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家庭状况的变化[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1):98-99.

②冯道杰.农业集体化“时代遗产”及其当代价值[J].山东经济,2011,(03):51-55.

③李捷枚.中国农村养老模式变革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5.

④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编审.新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1140-1141.

制度。五保制度继承和发展了我国传统社会对老弱群体保障关怀的思想,为我国农村养老事业确立了一条底线。1994年国务院颁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并在2006年对条例进行调整和补充,不断实现五保制度的规范化和制度化。^①

2.3.2 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养老支持

(1) 改革开放初期回归家庭保障

改革开放后农村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前提下,将土地使用权分给农民,这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极大激发了生产活力,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②同年,人民公社取消。农业集体化时期的集体生产生活方式不再存在,依存于集体的养老方式消解,养老责任又回归家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一方面摧毁了集体养老制度的经济基础,导致政府养老力量的缺失(注:这一时期五保制度仍在进行);但另一方面,它使得被破坏的农村经济得到恢复并极大发展,为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部分富裕农村自发地建立起小社区型的退休养老保险或补贴制度^③。

从集体养老保障过渡到以家庭养老保障为主体的农村养老保障在这一时期是极其脆弱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人的价值观念也更加多元化,老年人在家庭中已经不再拥有绝对权威,地位的下降使得老年人在家庭养老中更加弱势,迫切需要家庭之外的力量参与到农村养老中来。

(2) 国家力量介入农村养老

在对苏南地区较为富裕的乡镇进行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基础上,1992年民政部办公厅颁布《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并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1997年这一政策推广到全国。这个方案以县为单位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资金筹集方面坚持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④不久“老农保”就陷入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老农保”的试点工作主要在比较富裕的乡镇展

①吴晓林.中国五保养老保障研究:制度沿革、权利保护与策略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②邹进泰.张爱虎编著.激荡百年大国农业 1912-2012[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98.

③杜乃涛.农村经济问题探索[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214.

④贺蕊玲.浅析新农保与老农保的区别[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8(12):29-31.

开,为这种模式在更为广阔的贫困农村地区进行推广埋下隐患;费用以个人承担为主的筹资模式加重了农民负担,加上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大量农民断保,最终政策无法继续推行。

在“老农保”政策陷入困境后,2004年在江苏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改革探索就已经展开,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启动。^①“新农保”资金筹集原则上坚持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新农保”相较于“老农保”最大的进步在于筹集资金上由“老农保”时期的“以个人缴纳为主”改变为个人、集体、政府三者相结合,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由政府全额支付更直接体现了政府责任的回归。

2.4 本章小结

本章探讨了传统养老支持的形成与发展脉络,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的养老行为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先秦及以后历朝历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养老支持不断强化,使得传统养老支持具有了稳定的运行基础。在建国后政策变迁中中国农村养老支持也经历了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也完成了国家转型中农村养老的顺利过渡。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对农村养老支持投入相对不足,但从未缺位。传统农村养老支持历史演绎铸造了当今的中国农村养老的内在精神,建国后政策变迁下农村养老支持塑造了当今中国农村养老支持的外在架构。没有历史上农村养老的不断探索,就不会存在当今中国农村养老支持的持续运行。

^① 沈苏燕. 农民养老保障的政策优化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1.

第三章 农村养老支持供需系统

从农村养老支持的历史演绎中可以发现，农村养老具有极大的脆弱性，但即使这样农村养老仍然平稳运行了数千年，这一看似矛盾的结论却在现实中真实存在。本章将通过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供需模型的构建来解释农村养老支持系统持续运行的原因。

3.1 个案调查下的农村养老支持的现实运行

3.1.1 个案调查概况

本研究调查主要针对 H 省某村庄 N 村，N 村位于太行山区的一个水库移民区，人口 260 人，20 世纪 60 年代修水库采取就地后移安置，由于耕地大部分被淹没，人均耕地面积不足 3 分地（分，旧制土地单位，一亩等于十分），农业收入有限。主要经济来源为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多为建筑工地小工，日工资约 100~150，有个别木工、水暖工等收入较高工种，日工资约 200~300，此外还有政府针对水库移民每人总额 12000 元的补偿，从 2007 年开始分 20 年支付，每人每年合计 600 元，领取资格为库区农村户口（办理“农转非”者不享受此项补助）。还有政府对贫困人口的专项资金，但由于全部村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极端贫困户也几乎不存在，为避免矛盾，村里将该项资金平均分给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这种做法也得到普遍认可。除去常规的外出务工群体外，先后有村民开展过养牛、养羊、养鱼、养猪、养鸡等副业，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为保护环境，从 2010 年开始禁止牛羊上山，2016 年开展“清库”，禁止养鱼，养猪和养鸡由于市场风险较大，目前已无人进行养殖。近几年有外来承包商将村民流转的土地集中承包，种植果树，忙时雇佣本地村民，也是一项收入来源。支出方面，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子女教育、医疗、养老。

3.1.2 调查个案基本状况

编号 1：女，75，老伴 2016 年去世，两子两女，大儿子结婚，有一对双胞胎儿女，10 岁；小儿子年龄 45，没结婚；一女远嫁江苏，另一女嫁邻村，在 N 村最贫困。

编号 2：女，77，丧偶，三子两女，大儿子家在本村，全家常年在外，过年偶尔

回家，其他两个儿子定居外省，过年回家或接老人过去团圆。大女儿在本村小女儿在邻村。平常与大女儿共同居住。

编号 3：男，85，早年丧偶，居住在 N 村邻村 Z 村，四子三女。大儿子二儿子在 Z 村，三儿子到同省的另外一个市定居，四儿子小时候生病，一条腿坏掉，平常生活需要人照顾，三个女儿嫁到邻村。老人目前在老房子里和四儿子相依为命。

编号 4：女，78，一子三女，儿子进城定居，三个女儿嫁到附近村庄。2015 年得过脑血栓，身体状况差。老伴 2016 年去世前与老伴一起生活在老家，儿女经常探望。老伴去世后被儿子接到城里。

编号 5：女，65，两子三女，儿女均进城定居。和老伴一起生活在老家，老伴前几年做过手术，身体不好。

编号 6：男，62，一子一女，儿子进城市定居，女儿嫁到邻村，女儿经常探望。平时和老伴种植苹果，养蜂，有一定收入。

编号 7：女，98，早年丧偶，二子三女，两个儿子在本村，三个女儿在邻村。两个儿子不太孝顺，居住在与二儿子毗邻的老房子里。88 岁之前身体硬朗，性格刚强，还可以下地劳作。之后不小心摔断了腿，保守治疗，行动不便近 10 年，近三年靠子女照料。开始是把老人接到每个子女家中，每个月轮换一次，近一年来老人身体更差，基本认不出子女，改由子女去老人老房子轮换照顾，每周换一次。大儿子以身体差为由每个月出 500 元钱代替照顾老人。由于老人的子女年龄也较大，一部分照护责任实际上落到孙辈身上。

编号 8：男，64，二子一女，女儿嫁到邻村，大儿子在本村，小儿子在镇上。子女经济状况均较差，与老伴一起开小卖铺，偶尔也帮人做木工活取得一部分收入。

编号 9：女，73，丧偶，三子两女，三个儿子在本村，女儿在外地，与女儿平常无来往。大儿子在煤矿上班，二儿子和三儿子不务正业，比较偏爱小儿子，与小儿子一家一起居住，常将大儿子的接济转移给小儿子。

编号 10：女，86，丧偶，独居，与本村唯一的儿子关系一般，和孙子为邻。常常得到邻居接济的蔬菜等帮助。

编号 11：男，65，三子一女，儿子均定居城市，女儿嫁到镇上。长期担任村干部，组织包工队外出务工，收入较高，与老伴一起生活，会帮子女带孩子和给予金钱帮助。

编号 12：女，63，一子一女，女儿嫁到邻村，和老伴与儿子一家共同居住，老伴

常年在外打工，自己在家照顾孙辈，需要给予儿子一定经济支持。

编号 13：女，79，二子一女，子女均在本村，因中风瘫痪在床 14 年，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各子女按月轮替照顾，平常医药费子女平摊。

编号 14：女，78，丧偶，一子二女，与儿子共同居住，身体状况较为良好，开支较小。

编号 15：男，75，二子一女，女儿嫁到外地，两个儿子在本村，但常年外出务工，与老伴共同居住，二人身体均较为良好，土地靠自己耕种。

编号 16：男，69，二子，两个儿子均在本村，与老伴共同居住，种地为主要收入来源，近年身体状况变差，一条腿开始出问题。

编号 17：女，73，四子，因早年矛盾，与儿子关系较差，来往较少。与老伴共同居住，半年前摔倒，现在只能依靠双拐行动，生活困顿。

编号 18：男，62，二子，与老伴在家共同照顾四个孙辈，儿子儿媳在外打工，种地也是主要经济来源。

编号 19：男，61，一子一女，与老伴共同居住，子女均在外地安家。与老伴均为退休教师，退休工资较高，在本村属于高收入群体。

编号 20：女，83，二子，丧偶。两个儿子均在本村，年龄较大。自己一人独居，做不动的家务活依靠住得近的孙子。

编号 21：女，65，二子，与老伴共同生活，二人生活状况良好，两个儿子均在城市生活，夫妻二人每年有大半年时间在儿子家轮流住，其余时间回村里居住。

3.1.3 对农村养老支持现实运作的评析

(1) 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中的角色定位

由于历史上长期的君主专制，在我国政府往往被赋予“家长”角色，在农村尤甚，同时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也要求政府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而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客观现实使我们的政府在当下无法成为一个全能型政府。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中更多发挥着“兜底”的作用，在其他农村养老制度随着政策变迁不断发生改变的同时，“五保”制度不但保留下来，还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很好地说明了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中的“兜底”作用。N 村的五保制度仍然在运行，村民在遇到养老纠纷时在家族内

无法调解时，有困难找政府仍是他们最自然的想法，此时村干部往往被其视为政府的代言人，此外上级政府每年均需要拨付资金给 N 村。

(2) 农村养老保障与生产方式紧密相连

农村养老保障与生产方式或者说土地制度密切相关，每一次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变革都受到农村土地制度的影响。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是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家庭养老得以巩固；农业集体化时期土地归集体所有，集体化生产方式使集体养老成为可能；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再次以家庭为单位获得土地使用权，家庭养老成为农村养老主要方式；“老农保”时期适应市场经济下的乡-城人口流动农村劳动力的减少，而“新农保”时期的农村养老保障政策是在适应土地流转大背景下的人口迁移速度加快的产物，农村养老保障未来也必将在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调整的基础上进行变革。N 村大量的留守老人与本地资源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青壮年不得不进入城市打工密切相关。

(3) 农村养老的根本在于发展农村经济

农村养老保障政策与农村的生产方式息息相关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生产方式变革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农村养老保障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影响着农村包括养老在内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农村养老保障对于政府支持的依赖，保障方式更加多样化。而我国当前的城乡二元制下城乡差距依然在不断扩大，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农村的人才流失加剧了这一问题。农村养老的根本在于农村经济，寻求一条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才是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根本。发展 N 村的经济是提高其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根本。

(4) 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政策趋势

“新农保”目标在 2020 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而在 2014 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与之相适应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在做适当调整。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开始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在城乡户籍改革过渡期的实践中，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纳入到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体系中是较为普遍的做法，在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后，“新农保”也将完成其历史使命。

3.2 基于农村养老支持现实的供需模型构建

3.2.1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定义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强调用系统的而非单一的思维去看待农村养老，农村养老的各个构成部分是有机联系的，将这些有机联系的各个部分纳入到经济学中的供需模型中进行分析，构建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供需模型。

3.2.2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构成要素

农村养老支持供需模型包括养老支持供给侧和养老支持需求侧。在养老支持供给侧包括以非正式支持和正式支持两部分，分别以家庭和政府为中心；在养老支持需求侧，主要包括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内容。具体要素如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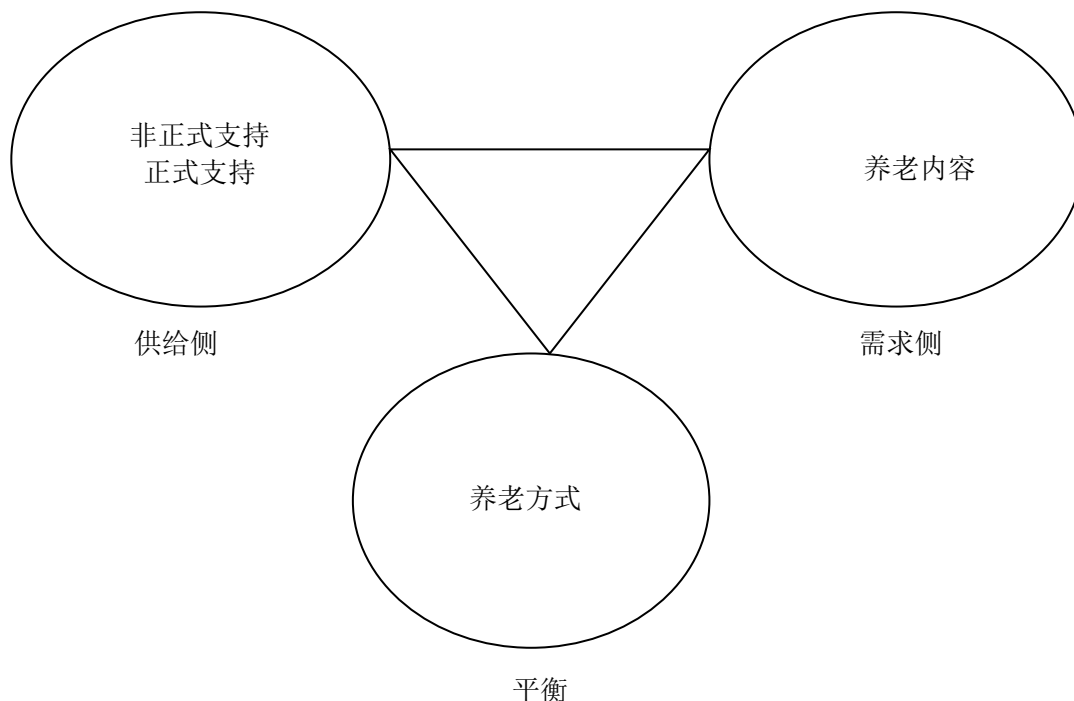


图 3-1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要素

Fig.3-1 The elements of rural pension support system

3.2.3 农村养老支持供需模型

养老资源的供给主体主要有老年人自身、家庭、国家、社区和社会，而其需求方主要是各种为老年群体。养老资源从养老供给侧流向养老需求侧，如图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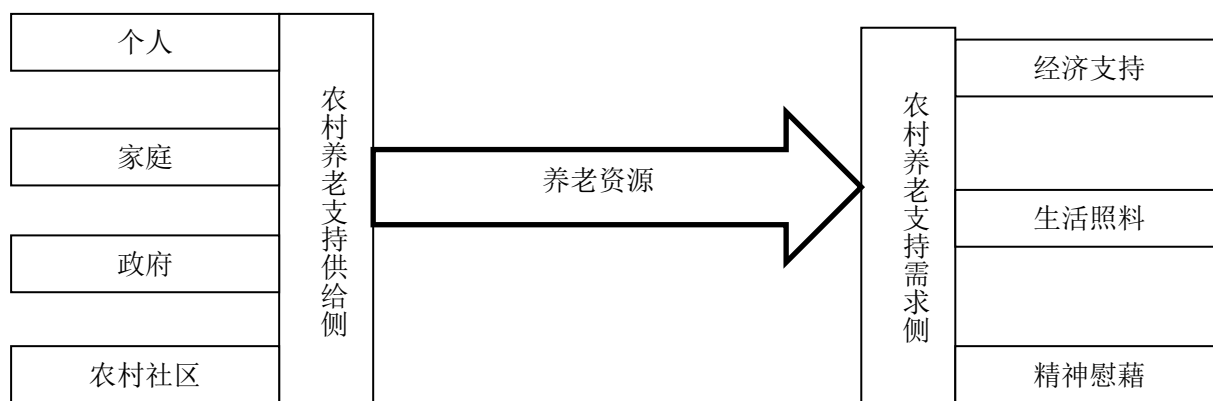


图 3-2 农村养老支持供需模型

Fig.3-2 The supply and demand model of rural pension support

3.3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供给侧

3.3.1 以家庭为中心的非正式支持

非正式支持强调没有政府直接干预，在对老龄问题的研究中，非正式养老支持从养老资源来源角度可以分为三类主体：家庭成员、亲属、非亲属，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体现了中国传统养老支持中的近亲-远亲-朋友-邻居-社会的关系序列^①。本研究在三主体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农村养老发展趋势，构建“个人-家庭-亲朋-邻里”四主体农村养老非正式支持系统。

(1) 老年人自养

农村老年人个体是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是养老资源的需求方，也是养老资源的提供方。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主要靠自己满足这一现象古已有之，但家庭财产的共有性使这种现象较少发生。在现代化冲击中，寻求自我保障成了更多农村老年人的被动选择。首先，“少子化”使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大家庭向小家庭不断演变，家庭承担养老风险的能力不断下降；其次，“城镇化”将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吸引到城市，进一步架空了原本脆弱的农村小家庭，失去家庭庇护的老年人个体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养老责任。

^①姚远.非正式支持理论与研究综述[J].中国人口科学,2003,(01):6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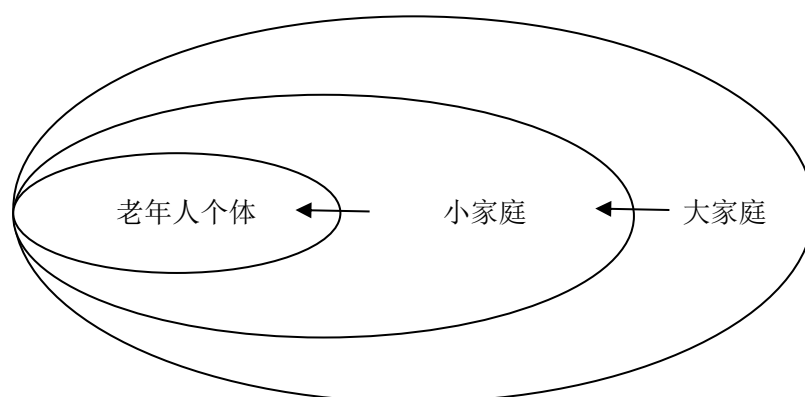


图 3-3 农村养老负担内化

Fig.3-3 The internalization of rural pension burden

由于收入渠道的单一性，长期以来农村老年人选择自养只能通过继续劳动或储蓄。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一直呈上升趋势，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农村老年人个体养老支持的上升。

表 3-1 中国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变化

Tab.3-1 Changes of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among rural elderly people in china

	60-64 岁 (%)	65 岁以上 (%)
第四次人口普查 (1990 年)	45.76	19.27
第五次人口普查 (2000 年)	65.8	32.86
第六次人口普查 (2010 年)	77.77	39.19

资料来源：第四到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庞丽华等学者^①通过调查中国 60 个村 1199 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分析指出，各年龄段农村老年人正式劳动参与 80%以上通过农业生产方式，年均劳动时间不超过 900 小时；20%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年均劳动时间达到 1400 小时。在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方面：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劳动参与率逐渐降低；男性劳动参与率高；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率更高，但也有高达 34%健康状况差的老年人参与劳动；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参与率越高；不与子女居住在一起或有子女外出打工的老年

①庞丽华,Scott Rozelle,Alan de Brauw.中国农村老人的劳动供给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3,(02):721-730.

人有更高的劳动参与率。需要注意的是,该调查未将家务劳动纳入劳动参与。随着我国土地流转制度的不断完善,依靠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收入的农村老年人可以通过出让土地的经营权获得一定收益,降低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参与率。

根据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农村老年人可以通过年轻时的储蓄来实现老年时期的安稳生活。商业储蓄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2) 家庭养老支持

家庭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主要包括三对关系:夫妻配偶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子代亲代关系。传统大家庭中亲代与子代尤其是父子关系往往处于核心地位。家庭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夫妻结婚组建家庭,第二阶段孩子出生,第三阶段孩子成长结婚组建新的家庭,第四阶段夫妻双方陆续死亡家庭解体。养老行为主要发生在第三和第四阶段,在夫妻双方都存活且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夫妻双方的相互支持是普遍存在的且最高效的。当夫妻中一方去世,子女对亲代的养老支持重要性上升,成为最重要的支持者。

中国农村的家庭养老支持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抚养-赡养”的双向代际互惠模式,传统的研究视角集中于子代对亲代的养老支持,对配偶之间的养老支持和兄弟姐妹之间相互的养老支持关注不够。随着家庭向核心化不断发展,夫妻关系代替亲子关系成为家庭的核心,夫妻之间的相互的养老支持将得到重视。

(3) 亲属养老支持

中国传统农村的亲友关系以“宗亲”为核心,“姻亲”为扩展。“宗亲”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强调家族观念,“姻亲”则以婚姻为纽带。格兰诺维特的“弱连接关系理论”认为,“强连接关系”中行动者有着高度互动,容易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导致系统内成员有着相似的形态,而“弱连接”关系能够在不同的团体中传递不同的资源与信息。“姻亲”亲属连结相较于“宗亲”亲属连结属于“弱连接”,两者所提供的养老支持内容的类型是不同的。突出体现在当突发事件中比如老人生病“宗亲”亲属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时,临时性的借贷通常由“姻亲”亲属提供。

(4) 邻里朋友养老支持

邻里互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于地缘相近而结成的“类亲属”关系在养老支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处比较和睦的邻里之间在称呼上通常遵循血缘宗族内部的辈份称呼,远亲不如近邻也正说明了这一关系的重要性。邻里养老支持指相邻而居的人

对于那些年老者给予的物质或生活上的帮助。在养老支持内容上看，邻里能够提供的养老支持包括日常生活帮助、对老人的陪伴聊天、以及在老人过世后丧葬仪式上的帮助等。由于农村生活的封闭性，邻里关系对农村老人而言往往也意味着朋友关系，而农村同一家族的聚族而居使得邻里和亲属两种关系也部分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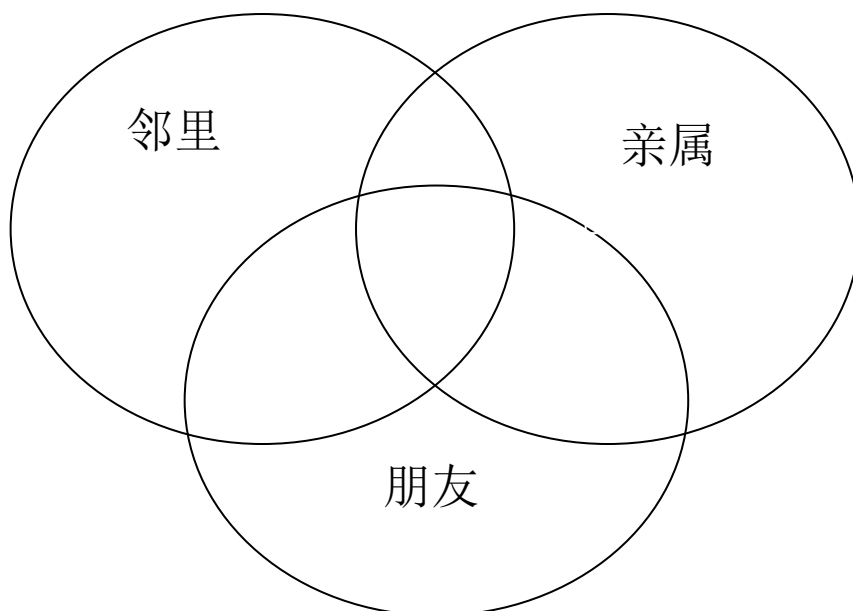


图 3-4 乡村社会“邻里-亲属-朋友”关系

Fig.3-4 The "neighborhood - relatives - friends" relationship in rural society

从图 3-4 可以看出，在乡村社会中，“邻里-亲属-朋友”的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的，往往是“二位一体”或“三位一体”的。随着同一对象的身份多重性不断增加，其所能提供的养老支持作用越来越大。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逐渐衰退，在生活起居方面难免需要一些帮助，单纯的邻里关系给予的养老支持也是最为简单的，通常是日常生活中的细微小事，比如帮老人提重物、修理电器等；随着邻里关系与朋友、亲属关系重合度的不断提高，其发挥的养老支持作用越来越大。同时相邻而居这种天然优势使得有多重关系的邻里比其他亲友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提供更及时和低成本的支持。

3.3.2 以政府为中心的正式支持

(1) 农村养老支持中的政府责任

建国后中国长期实行城乡不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国家力量推动下，通过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实现了资本高积累，实现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农民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同时让广大人民群众贡献发展成果还是社

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此外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也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对农民的养老支持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三部分^①。

政府在农村养老支持中的政治责任指在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支持保障中政府要根据国情,确立正确的执政理念,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主要包括选择合适的养老制度和保障农民的养老权利两个方面。农村养老正处于一场时代大变革中,其中充满着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无法靠农民自身的努力去规避,也无法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去消解,必须依靠政府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去调节,因此农村养老合理的养老制度选择是政府的首要责任。在制度选择中农民的基本养老权利必须得到满足,这符合我国宪法要求对公民的养老权的保障,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政府在农村养老支持中的经济责任指政府要承担农村养老保障中的资金管理责任。首先是资金的来源,政府需要对农村养老进行财政支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与农业产品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矛盾使不可或缺的农民陷入低收入的困境,导致其养老积累不足,政府有责任对其进行财政支持。对于各方面的农村养老资金政府需要对其运行、分配进行管理和监督。

政府在农村养老支持中的社会责任指政府需要引导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型养老文化,实现养老制度与养老文化的协调发展。

(2) 地方政府农村养老保险实践

根据农村养老支持中的政府责任可知我国政府在农村养老中主要发挥着养老制度建设与养老文化引导的作用,而农村养老保险是农村养老制度建设中的重中之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中央政府主要从宏观对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和大的制度框架进行规定,尤其是在当期养老保险资金省级统筹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农村养老保险实践具有多样性和灵活性。“嘉兴模式”和“宝鸡模式”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险实践较早也较为成功的两种模式。

^①郑军.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理论框架:基于制度文化的视角[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10):99-107.

表 3-2 农村养老保险“嘉兴模式”

Tab.3-2 The "Jiaxing model" of rural pension insurance

嘉兴模式	
覆盖人群	嘉兴行政区内，16-60 岁，未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对于政策实施前已超过 60 周岁的，可一次性缴费满 15 年；政策实施前已满 70 周岁的，享受养老基本生活补助
基金筹集	由个人缴费和财政补贴两部分构成。个人缴费比例为上上年度人均纯收入的 8%。财政补贴为上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5%
待遇支付	年满 60 周岁，缴费满 15 年，可按规定领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缴费年限不满 15 年，可延期缴费
制度衔接	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与原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与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的衔接

资料来源：2007 年《嘉兴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

“嘉兴模式”在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嘉兴地区开展，最早提出了将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与城市养老保险融合为一种制度的构想。这一构想建立在嘉兴市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较高且差距较小的基础之上，2005 年嘉兴农村居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分别为 8007 元和 16189 元，而同期的全国平均分别为 3254 元与 11320 元。值得注意的是，2014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嘉兴模式”由地方实践上升为一种全国性的制度。

表 3-3 农村养老保险“宝鸡模式”^①

Tab.3-3 The "Baoji model" of rural pension insurance

宝鸡模式	
覆盖人群	宝鸡市农业户籍，年满 18 周岁，未参加其他社会养老保险
筹资模式	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财政补贴相结合
补贴模式	建立了缴费和养老两项财政补贴制度
基金模式	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基金
养老金给付	待遇相对确定型

资料来源：2007 年宝鸡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行办法》。

“宝鸡模式”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一个示范。筹资模式上，在

^① 黄庆杰.城乡统筹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选择与政府责任[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

个人、集体、政府之外，还鼓励多种力量扶持。而在政府补贴上，“宝鸡模式”的总补贴为 90 元，根据嘉兴 2005 年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8007 元计算，制度设计之初的“嘉兴模式”补贴在 400 元以上，反映了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农村在养老保险资金筹集上的巨大差距。

（3）农村社区的养老支持

农村社区指农民依靠土地，通过地缘和血缘等纽带维系形成的生活共同体。通常是以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规模较小、结构比较简单的社区，农民生活的社区环境决定了农民的包括养老在内的一系列行为方式。传统农村社区最大的特点是“乡土自治”，随着建国后国家权力的向下扩展，原先的“国家-士绅-农民”的乡村权力传递被“国家-农民”的关系所取代，农村社区的自治性大大弱化，农村社区的运行受到政府的直接影响，比如对于没有集体收入的农村，需要开展各项活动的资金来源，往往需要上级政府的拨付来解决；对于那些有集体收入的农村，随着投入的不断扩大，也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前屯村在 2008 年集体成立“互助幸福院”，年满 60 周岁，无配偶子女、配偶照顾的独身能够自理的老人，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可免费入住，但其他开销仍需老人出资。“互助幸福院”只接收能够自理生活的相对健康的老人，老人自我管理、互助服务，如果身体条件变差不能自理就要搬出幸福院，身体好转后仍可以搬回幸福院。这种模式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也能够契合老年的需求。固有的乡土情结使农民不愿意离开他生活的环境。幸福院的模式能当村解决养老，老人们一起生活，相互照料、扶持。这种养老模式综合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三种主流养老模式的优势，“肥乡模式”已经成为全国农村养老的一个范本。截至 2016 年初，在肥乡县民政部门的推动下，肥乡县已建成互助养老院 240 家（包括联建 25 家），实现 265 个村庄全覆盖。除肥乡模式外，还有许多成功的农村社区养老实践案例。

表 3-4 农村社区养老实践^①

Tab.3-4 Rural community pension practice

恩施模式	由村里声望高的老年人发起的老年协会为核心开展养老互助活动，包括高收入老人与贫困老人的结对帮扶、划片区互助养老等，老年协会还组织老人开展文娱活动、调节家庭纠纷、提供法律帮助等
米脂模式	以邻里互助为核心，政府出资聘用当地妇女为老年人提供家政服务。满足老年人家务料理、生活陪护等需求。
罗源模式	开展慈善安居楼项目，将困难老人集中供养。

3.4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需求侧

3.4.1 老年群体的差异

老年群体的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每个年代的老年人必定与其不同时代的老年人不同，同一时代的老年人内部也有差异。鉴于此，对农村养老研究首先需要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分层。

戴维·波普诺在其《社会学》一书中指出“社会分层是一种根据获得社会需求物品的方式来决定人们在社会位置中的群体等级或类属的一种持久模式”^②。对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分层是多样化的，现实生活中由于不同的农村老年人掌握的社会资源情况不同，对资源的支配力也不同，对老年人的外部评价会产生差异。例如可以根据经济状况将老年人划分为高收入阶层老人、中等收入阶层老人、低收入阶层老人。此外，还可以根据年龄将老年人分为低龄老人、中龄老人、高龄老人。还可以按地区、教育程度等对老年人进行分层，值得注意的是，同一老年群体内部仍然可以细分。

①卢艳,张永理.社会支持网络视角下的农村互助养老研究[J].宁夏党校学报,2015,17(03):69-72.

②(美)波普诺,李强等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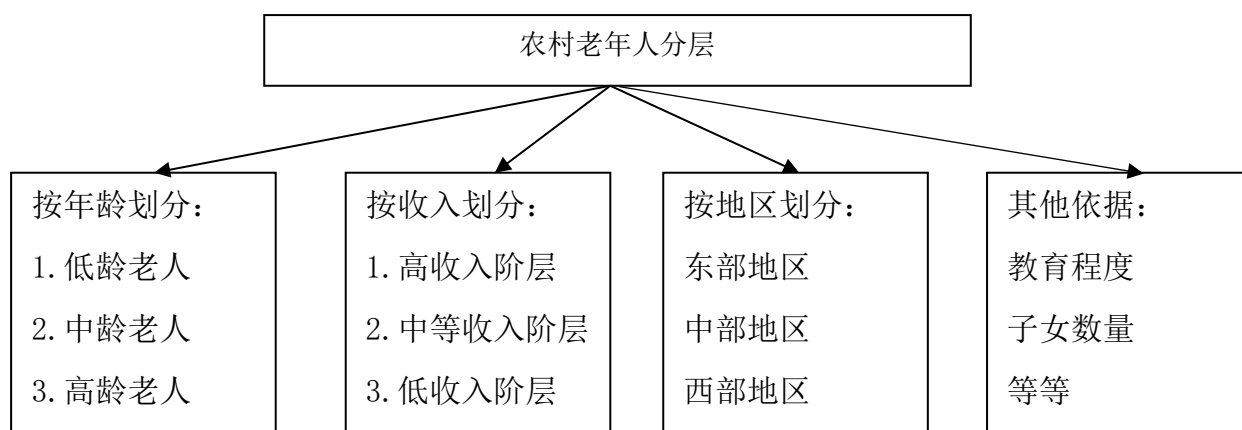


图 3-5 农村老年人分层

Fig.3-5 The stratification of Rural aged

3.4.2 老年人需求内容

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照顾老年人特殊需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明确规定的。老年人由于各项身体机能的下降，产生了不同于青年人的需求，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是学者公认的老年人需求的三个方面。

(1) 经济支持

老年人的经济支持长期以来受到广泛关注，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是老年人获得自我认同和外界认同的最基本条件。由于老年人身体的老化劳动效率降低使其经济来源较少且极不稳定。不同于城市老年人可以在退休前的工作中积累一定的资金作为其退休后的养老金，农村老年人在青壮年时期的经济收入积累通常不足以满足其养老需求。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农村老年人不得不通过一定的劳动参与获取一定的经济报酬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农村老年人自我劳动参与是其满足经济支持的首要方式，我国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居高不下。在自我经济支持仍不能满足基本生活时子女的经济支持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子女经济支持与子女经济状况密切相关。这造成了农村养老具有较大的风险性。有一点需要注意，农村老年人对经济支持的要求并不高，通常只要求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历史上长期处于贫困状况的中国农民对生活的一种适应。除了个人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外，处于极端贫困的农村老年人可以获得一些政府福利性救济，比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五保”资金。这些国家无偿提供的资金起到了对农村养老的托底作用。

(2) 生活照料

老年人生活照料需求主要源于其身体机能的老化,当前的老龄化与城镇化使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矛盾凸显。首先,农村老年人寿命的延长使得高龄老年人数量增加,高龄老年人比低龄老年人所面临的疾病风险更大,其照顾需求也更大;而城镇化则把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吸引到城市,农村照顾老年人的人力资源不断减少。

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配偶和子女获得生活照料。低龄老年人通常自我照料,同时还要照料孙辈;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条件的下降,往往需要通过配偶的相互扶持;当夫妻双方有一方去世,生存的一方身体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子女要承担大部分照料责任。从农村老年人整个生活照料过程中可以看出其生活的负担并不轻松,也一直处于“养儿防老天经地义”的传统养老观念与“能不麻烦子女尽量不麻烦子女”的独立自主观念的双重矛盾中。

(3) 精神慰藉

对老年人精神慰藉的观念古已有之,孔子提出“色难”是孝的最高境界。随着时代发展,当老年人基本生活得以保障,怎样使其度过更有尊严的老年生活将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包括内外两个方面,从老年人自身来讲,老年价值的实现是对其最大的精神慰藉;从外部环境来讲,国家层面要引导社会形成与时代相适应的尊老的社会风气,加大对农村地区文化设施的建设;家庭层面要做好对老年人的生活照顾,创造和谐的家庭养老环境。

(4) 三者之间的关系

老年人需求内容的三个方面通常被学者认为是层进的关系,即经济支持是首先应当满足的,在此基础上应该满足老年人生活照料的需求,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则是最高要求。而从农村养老支持的现实中可以发现,这三个方面更多是并列而非层进的关系。在农村养老实践中,对老年人生活上的照料是发生频率最高的,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正来源于日常生活中和老人相处的点滴,给予老年人经济上的支持会使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一定范围内上升,超出了这一范围,经济支持的差异并不会给老年人养老效用带来多大差别。

3.5 本章小结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它是中国农村养老历经千年不曾中断的

幕后英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有着不同的内容，一直在与时俱进，本章构建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供需模型只是其中一种形态或者说解释方式。本章首先通过对河南省北部的一个农村 N 村进行个案调研，通过真实微观个例去丰富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认识。在此基础上认识当代中国农村养老支持的实际运作。通过将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纳入到供需模型中进行分析，在模型的供给侧，分为非正式养老支持和正式养老支持两个子系统，分别以家庭和政府为核心；在模型的需求侧，老年人的群体差异和需求内容是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的老年群体对于在养老需求内容上会有所差异。农村养老支持供需系统有着动态性、坚韧性的特点，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一系统会进行自我调整，这也赋予了它更大的韧性去面对各种冲击，使得脆弱的农村养老不会产生巨大波动。

第四章 社会转型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冲击

4.1 市场化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冲击

1978年在“如何加快建设现代化务虚会”上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标志着我国市场化开始兴起，此后在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上提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4年提出“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在面对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关键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最终在中共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①可以看出，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国的市场化建设也在不断推进。

而中国农村地区也受到了市场化的影响，传统的乡土社会逻辑不断向市场逻辑转变，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不断冲击。

4.1.1 市场化对农村养老非正式支持系统的冲击

(1) 对老年人自我养老冲击

市场化意味着在更广阔的空间开展经济活动，这种开放性与传统的乡土社会的封闭性形成鲜明对比，带来巨大冲击。这种开放性首先对乡土社会的价格体系产生影响，更大的波动性使农村老年人的农业生产收入更加不确定；更进一步带来的思想观念、交往方式的改变使传统的乡土社会的秩序受到打击，往往使处于变革中的老年人无所适从。

(2) 对农村家庭养老冲击

传统的乡土观念认为子女需要满足年老的父母从经济支持到生活照料到精神慰

^①周新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改革与战略,2017,(10):66-76.

藉多方面的需求，和父母共同居住有利于子代与亲代的交流，是一种融合经济支持、生活照顾、精神慰藉的养老居住方式，因此得以长期存在。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还有个人生活观念的改变，当前农村地区与父母同住的比例在不断下降。

（3）对邻里亲朋养老支持冲击

市场化极大冲击着乡土社会的儒家伦理，改变着农民之间的交往方式，扩大着农民的交往范围，基于血缘和地缘建立起来的乡土社会交往规则随之改变。邻里互助的优良传统在市场化中被追求最大利益的个体取代。

4.1.2 市场化对农村养老正式支持系统的冲击

（1）对农村社区养老支持的冲击

传统的农村社区建立在血缘与地缘基础之上，这使得在农村社区内部是一个整体。此时的农村社区处于普遍贫困中，资源虽然存在于家庭但相互之间的需要使资源在农村社区中的流动性较强。市场化使农村社区内部产生分化，一部分人通过市场富裕起来，抵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而另一部分人在市场化中生活状况变得更差，这种分化使得农村社区养老支持成为一盘散沙。

（2）对政府养老支持冲击

市场化冲击提高了政府对农村养老支持的成本。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个熟人社会，在长期交往中往往形成了一系列村规民约，这些村规民约能够在不需要国家介入的情况下处理大部分农村内部的事务，包括养老事务，强大的舆论环境和宗族内部的互助使得赡养老人的观念不断得到强化。而市场化部分消解了村规民约在农村养老中的积极力量，使国家政权直接面对一个个单个的农民，政府进行养老支持的筛选成本是巨大的。

4.2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支持系统运行

4.2.1 老龄化下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供给侧

（1）自我养老支持

老龄化对个体而言最直接的影响是个体寿命的延长，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只能通过储蓄或继续劳动获得养老资金，而个体寿命的不断延长出现更多高龄老年人，通常

情况下高龄老年人无法继续农业劳动, 储蓄的养老资金也由于寿命的延长出现不够花的状况, 这迫使老年人不得不向外界寻求养老资源。另一方面, 长寿人群中女性比男性数量多, 老龄化将使老年妇女的养老支持状况进一步恶化。

(2) 家庭养老支持

传统的家庭养老通常以子代对亲代的供养为主要形式, 在家庭小型化的同时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口增多, 造成需要照顾的老年人口数量多于能够提供照顾的中青年人口数量; 而随着老龄化伴随的寿命延长, 家庭养老中高龄老人的子女也是老年人的一部分, 难以完成照料任务。

(3) 政府养老支持

老龄化首先导致老年人口的扩大, 将增加政府在农村养老支持的资金投入, 挤压农村其他事业发展投入, 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 更多的长寿老年人口还意味着不能自理的高龄老人数量增加, 对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甚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 政府还肩负着制定养老政策的重任, 老龄化将增加政策制定的难度和风险。

4.2.2 老龄化下农村养老支持系统需求侧

(1) 养老观念的改变

人口老龄化使传统的子代与亲代养老反馈模式难以继续, 必然冲击老年人的养老观念。首先, 养老对老年人而言从消极的被动等待养老到为老年期生活做终生准备, 老年人生命阶段的前期消费将随之减少, 既然养儿不能防老, 加上抚育成本上升, 生育意愿也随之下降, 又反过来冲击着子女养老的传统观念。

(2) 不同群体老年人的分层

根据分层理论, 老年人内部存在巨大差异, 老龄化将加大这种差异并对不同的老年群体产生深远影响。首先, 老龄化伴随着高龄化, 由于性别分层中女性通常比男性更长寿, 丧偶老人尤其是丧偶老年妇女的状况将进一步恶化; 其次, 由于东中西部的经济差距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消失, 新增加的劳动力将继续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 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老年人的状况将恶化; 老年群体的壮大还伴随老年群体内部分层的细化, 而这些细分的老年群体在利益诉求上必将产生巨大分歧。哪一部分老年人的需求应该优先满足将为决策者带来前所未有的难题, 对老年人而言, 如何使自己的多样化

需求得到满足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4.3 老龄化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动态冲击

4.3.1 老龄化发展态势

曾毅研究表明我国 21 世纪上半页人口老龄化具有“二高三大”特征：高速化、高龄化、老年数量大、老年抚养比大、地区差异大^①。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1.44 亿人，占总人口的 10.47%，而 1996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只占总人口比重为 6.4%，并且中国的老龄化正在加速。同时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由 1996 年的 70.8 岁提高到 2015 年的 76.34 岁，中国人变得更加长寿，80 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由 2003 年的 1.17% 上升到 1.9%。^②在抚养比方面，我国老年抚养比从上世纪 90 年代到现在一直呈上升趋势，已经由 1996 年的 9.5% 上升到 2010 年的 12.3%，但由于同时期的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且变动幅度较老年抚养比变动幅度大，总抚养比总体上在不断下降。但从 2011 年开始，我国老年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均呈上升态势，总抚养比正在迅速攀升。

我国老龄化地区差异大，从总体上看，中国人口老龄化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有逐渐扩大趋势。区域内差异长期呈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长期呈收敛趋势，区域内差异远大于区域间差异。^③由于我国长期的二元制经济社会结构，老龄化在城乡之间也存在差异。杜鹏、王武林研究结果表明，老龄化进程中的城乡倒置是世界老龄化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不会长期持续，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城乡人口迁移基本完成，城市老年人口比例最终将超过农村。^④

4.3.2 老龄化冲击的动态性

中国从 21 世纪初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刚刚起步的老龄化尚未对农村养老造成巨大的麻烦，但可以预见的是，老龄化将在整个 21 世纪伴随中国的发展进程，同时中国的农村养老事业也将长期存在，老龄化将对农村养老产生持续性冲击，这种持续性冲击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影响越来越大。

^①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05):3-29.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③陈明华,郝国彩.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04):136-141.

^④杜鹏,王武林.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的转变[J].人口研究,2010,(02):3-10.

(1) 农村养老存在的长期性

农村养老是一个历史概念，将在我国继续长期存在。首先，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存在。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将近一半，这些人口不可能在短期内被城市消化。其次，农业是我国基础性产业，农民是维持这一基础性产业的根本，是不可替代的，农民的养老问题自然也将长期存在。此外，农村不仅仅是一种行政区划概念，同时是一种文化概念，作为行政区划概念的农村可能会消失，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意义上的农村养老将长期存在。

(2) 老龄化发展的动态性

中国的老龄化刚刚起步，但由于人口结构已经从根本上发生变化，生育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诸多因素共同导致了当前的老龄化趋势是不可逆的，差别在于进程的速度上。老龄化进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老龄化的缓慢发展期，由于生育率高，人均寿命较低，老年人数量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第二阶段是老龄化程度的快速攀升期，随着人均寿命的大幅提高，生育意愿的迅速降低，整个人口的年龄中位数迅速上升，老年人数量大幅增加，我国的老龄化正处于这一阶段；第三阶段是老龄化的保持期，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点后，生育意愿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人均平均寿命增长缓慢，老龄化程度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总人口减少；第四阶段是缓慢下降期，随着总人口的不断减少，出生率不断接近死亡率，老龄化程度缓慢下降。

4.3.3 老龄化冲击对农村养老的影响

(1) 农村养老需求的上升

老龄化伴随着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增加的这部分老年人将稀释原先的养老资源，如果投入保持不变，每个老年人的福利是下降的；老龄化往往还伴随着高龄化，高龄老人的患病风险和不能自理的风险远远大于低龄老年人，用于一个高龄老人的养老资源可以负担数个低龄老人，高龄老人的增加将进一步推动养老需求的迅速上升。

(2) 农村养老支持力的弱化

高龄老人数量增加将减弱农村老年人的自我养老支持，高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将大大降低，而这部分收入是老年人的重要收入来源。高龄化同时也加重了家庭养老负担，以独生子女家庭为例，随着老龄化不断深化，原先一对夫妻供养四个老人可能变成需要同时供养八个老人，家庭所能提供的养老支持不足。老龄化将对农村社区的邻

里互助产生巨大打击，老龄化使农村的老年人比重占多数，无法有效进行邻里互助的养老支持。老龄化对短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没有定论，但将每年的产出中的一大块用于由于老龄化新增的老年人口，势必影响公共储蓄，进而影响长期投资，打击长期经济发展，不利于政府对农村养老的持续支持。

4.4 本章小结

农村养老支持在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最大冲击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化冲击，本章首先探究市场化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冲击，当前来势汹汹的老龄化，又将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各个子系统进行全面冲击，面对老龄化将对农村养老支持的持续性冲击，应对市场化冲击的经验也不足以应对此次冲击，而农村养老的现实也并没有充分做好应对老龄化冲击的准备，因此需要一种新的老龄化视角，通过新的老龄化视角下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调适来实现农村养老的平稳过渡。

第五章 应对思路：由静态到动态

国际上通常将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10% 或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7% 认定为该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①显示：截止 2015 年 11 月 1 日零时，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2182 万人，占总人口的 16.15%，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4374 万人，占总人口 10.47%，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同“六普”相比上升 2.89 个百分点。

研究表明，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会冲击我国现行的养老制度，增加医疗支出，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同时也会促使我国调整人口政策，发展老龄产业。毫不夸张地说，老龄化正在重新塑造中国。为了更好地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把握其带来的机遇，需要中国特色的老龄化分析框架，但形成于世纪之交的传统老龄化分析框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我国老龄化发展态势，必须进一步把握其本质，转变老龄化研究视角。这就需要从传统的静态老龄化研究出发，构建一种动态老龄化分析框架。

5.1 老龄化理论的转变

5.1.1 老龄化理论的推进过程

对待老龄化从最初的恐惧、排斥发展到承认、接受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理论界也是如此。从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理论与实践就不断推进着对老龄化的认识。在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对待老龄化的态度也越来越开明和积极，为进一步推进老龄化研究视角的转变创造了可能性。

(1) 排斥老龄化

老龄化现象出现初期，人们将它视为洪水猛兽。人们潜意识里将老与“失败”、“腐朽”、“坏”等消极词汇联系在一起，第一反应是怎样规避老龄化，这种最早的对老龄

^①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0_1346151.html.

化的负面认知影响至今。

（2）成功老龄化

随着对老龄化研究的不断深入，20世纪80年代学者将老龄化分为正常的老龄化和受损的老龄化。1987年美国学者 Rowe 与 Kahn 提出成功老龄化，认为之前的研究夸大了老年人的平均功能缺损情况，忽视了老年人口的异质性。成功老龄化从老年人个体的身心健康出发，指出老年个体之间健康状况具有极大差异性，探索老年人保持健康状态的方式和方法，实现老年群体的成功老龄化是摆脱老龄化困境的一种出路。

（3）健康老龄化

与成功老龄化同一时期，世界卫生组织在1987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提出了健康老龄化。该理论认为老年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仍可以拥有较为良好的身心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性，老年群体的多数都能够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相对健康的状态^①，人口系统与经济、社会、文化等系统之间关系健康。

（4）产出性老龄化

Robert Butler 首次使用这一概念提醒人们关注老年人的能力和他们对家庭、社区做出的宝贵贡献。产出性老龄化认为老年人活动可以分为内向性活动和外向性活动两个方面。内向性活动指老年人可以自我照料、继续学习、提升自己，外向性活动指老年人可以就业、参与社区事务、照料他人等活动。

（5）积极老龄化

世界卫生组织为克服健康老龄化局限于健康促进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积极老龄化理念。这一理念在先前老龄化理论上强调老年人权利与老年参与。老年人不是负担，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老年政策的制定要充分考虑老年人权利和积极发挥老年人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5.1.2 传统的视角：静态老龄化

我国老龄化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传统的老龄化研究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形成了以研究老龄化的成因、影响因素以及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为核心^②，研究重点从传统的人口学研究向交叉学科发展的基本研究框架。时至今日，老

^①赵怀娟,朱艳松.老龄化研究新视角及其政策因应[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2,(09):1969-1971.

^②杜鹏.人口老龄化研究的进展[J].中国人口科学,1999,(04):57-58.

龄化研究学者对老龄化的研究没有从本质上突破这一传统的分析框架，近 20 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老龄化分析框架常常无法解释老龄化发展的最新现实。为讨论的方便起见，将传统的老龄化分析方式定义为静态老龄化。

静态老龄化从老龄化的成因、现状趋势以及社会经济影响展开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对老龄化的成因探究从死亡率、出生率、人口迁移三个角度对其分析，揭示了我国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计划生育政策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我国老龄化加快一大半是由巨大的人口结构惯性导致的；对我国老龄化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研究表明由于大量农村青壮年由农村迁移到城市，使城乡老龄化倒置，但这一现象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对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表明老龄化是一把双刃剑，其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果也是复杂的，老龄化带来人口结构变动的同时，也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动。

我国在应对与老龄化相关的农村养老中出现诸多问题，这是由当前静态老龄化研究的不足导致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对老龄化的本身研究不足

尽管我国对老龄化的研究从上世纪 80 年代已经展开，但直到今天，老龄化依然是作为一种既定的现象来对待。涉及老龄化的研究，绝大多数并非探讨老龄化本身，而是将老龄化作为一个既定的背景，来探讨“老龄化之后”的，而对老龄化本身的学理探讨及其有限。研究老龄化，应首先研究老龄化自身，对老龄化概念本身的明晰、探究老龄化发展的规律、老龄化完整的研究框架。只有将老龄化研究由外而内进行推进，才能更接近老龄化的本质，寻求应对之道。

（2）思维僵化，以西方视角看待中国问题

由于我国老龄化研究起步较晚，对老龄化研究的理论往往从西方引入。这在老龄化研究初期有其必要性，毕竟中外老龄化有其共性。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理论与现实的脱节越来越严重。因为在共性之外，各国各地区老龄化也存在差别。首先，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甚至比西欧各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因此从治理人口小国搬过来的理论去应用于人口大国的现实，很难完全契合；其次，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老龄化进程的最根本原因，这就导致我国与西方的老龄化进程的非同步性，以下一阶段的理论去看待上一阶段的现实也是非理性的；再次，中国特殊的二元制社会经济体制与发达国家也有

巨大差别，虽然发达国家也有城乡差距，但并非如我国的城乡差距这样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鉴于以上几点，我们应该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老龄化理论。

（3）问题意识为核心

我国现有的老龄化研究虽然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理论，但始终把老龄化的应对作为研究核心，这就导致我国老龄化研究始终是有一种问题意识与忧患意识，忽视了老龄化的建设性。老龄化作为人类历史普遍的发展过程，有其存在的历史必要性。当下的老龄化进程正在重新塑造整个世界，过度强调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将不断投入精力去对抗老龄化。应该进一步转变思想，将老龄化视为历史发展的阶段，去适应而非一味去对抗。老龄化当前表面上带来的种种问题只是老龄化发展进程与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速度的不一致造成的，并非老龄化本身的问题。

5.1.3 新的理论视角：动态老龄化

动态老龄化是指在老龄化进程中老龄化的内部构成和外部环境均在发生变化。动态老龄化将老龄化看作一个变化的过程，与之相关的老龄问题的解决将与老龄化内部构成的动态变化和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间的匹配程度密切相关。老龄化作为一个变动的过程，无论其内部还是所处的外部环境都在发生着剧烈变化。当前对老龄化本质的研究多关注老龄化的内部变化，往往忽视其得以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变化。动态老龄化研究的核心在于不仅仅要同时关注老龄化内外部变化，还应该关注老龄化的内部变化如何与其外部变化相适应，实现老龄化内外部变化的统一联动。

（1）老龄化内部变化

老龄化的内部构成变化指老年人寿命、老年人身体状况、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和老年人观念在发生着变化。

老年人寿命变化。我国 1957 年人口平均寿命为 57 岁，1981 年为 68 岁，1985 年为 68.97 岁^①，2010 年为 74.83 岁，2015 年为 76.34 岁^②，在未来将继续增加，但增加的速度将放缓。更加长寿的老年人不仅意味着需要更多养老资源的投入，同时还会造成代际叠加带来更多的养老问题。

①资料来源：林万孝. 我国历代人的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J]. 生命与灾害, 1996, 第 5 期.

②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老年人身体状况变化。在更加长寿的同时，老年人正变得更加健康，尤其是低龄老年人，相比历史上同年龄段的人身体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但由于老年人数量的增多与长寿化，中国高龄失能老人的绝对数量在不断增多。

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变化。由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教育不足和之后对教育的大力推广，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大学扩招，将使未来的老年人受教育程度有极大提高。老年群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一方面可以增加我国人力资源存量，另一方面使老年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更强，养老需求更加多样化。

老年人观念变化。老年人的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首先是老年人独立意识的增强，老年人越来越多选择与子女分开居住，养老观念也由养儿防老转变为尽量不麻烦子女。老年人观念的转变要求我们对待养老问题应该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

（2）老龄化外部变化

老龄化的外部环境变化主要包括老龄化所面对的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四方面。

政治上，老龄化面临政府执政方式的转变，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应对老龄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由“家长”转向协同者，让人民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更多的参与权意味着更大的话语权，老年人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治理将改善老年人被边缘化的境况。

经济上，老龄产业在不断发展壮大。不同于传统的产业革新在不断排斥老年人，新一轮的老龄产业发展应该使老年人成为最大受益者。一方面老龄产业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养老资源，另一方面在岗位设置上应该充分考虑老年人自身状况，使更多的老年人参与进来。

技术上，技术是老龄化外部环境改变最重要的因素。它改变着政府对老龄化的管理方式，推动着老龄产业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各种信息传播媒介改变着大众对老龄化的看法。更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养老领域，可以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同时更大程度地解放老年人，更便利地参与社会活动。

文化上，公众对老龄化的观念和态度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公众对老龄化的看法正经历着由排斥到承认的过程，未来将接纳老龄化。我国传统的农耕社会老年人发挥着农业经验传授的功能，老年人有着较高地位；工业化的各个环节有利于年轻人排斥老年人，老年人地位下降。目前的老龄化将重新塑造世界，老年人的地位将再次上升。

（3）老龄化内外变化的统一

动态老龄化关注老龄化内外变化，并在内外变化的四个统一中实现对老龄化可能引发的问题的解决。

首先，老年人数量的增多和社会地位提高的统一。动态老龄化下更加健康长寿的老年群体的壮大有利于提高老年人话语权，而由管理向治理转变、鼓励民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开辟了道路。老年群体将通过话语权的提高将更多的老年人诉求转化为政策，为自身谋求更大的权益，创建一个更适合老年人生活的社会环境。

其次，更加健康的老人与老年社会参与的统一。现在的老年人比历史时期同年龄段的老年人有着更加良好的身体条件，但由于固有观念和分工体系的影响，老年人很难参与到社会建设中去，往往被视为负担。老龄化正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变革，在设计新的分工体系时充分考虑更加健康的老年人这一客观事实是动态老龄化的要求。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参与的条件，老年人也是宝贵的资源。

再次，更加多样的需求与供给的统一。静态老龄化视角下对偏重于社会对老年人的看法，社会依照自己的想象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资源，以供给决定需求。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社会提供的养老资源不一定是老年人需要的。动态老龄化同时关注老年人自身，随着老年人自主意识的增强，养老需求将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以老年人的需求为核心，将实现更有效率的养老资源配置。

最后，老年人自身观念与社会对老年人观念的统一。家庭养老的式微是社会对养老忧虑的重要原因，千百年来的家庭养老传统被打破，中国的老年人该往哪里去是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动态老龄化认为老年人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着极大变化。

5.2 分析视角的转变

5.2.1 转变的原因：困境与出路

尽管静态老龄化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成为分析养老问题的一条重要路径，但也存在着不足。其始终无法突破世纪之交就已经确立的老龄化分析框架，只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调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在近 20 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龄化也在不断发展。当前仍有许多研究者将人口老龄化视为一种社会负担，力求在传统的逻辑框架内探讨防止或延缓老龄化的种种途径，这种静态老龄化思维其实是用 20 世

纪的思路和方法来应对 21 世纪的挑战，难以真正解决问题。^①老龄化最直接的影响是加剧养老问题。传统的静态老龄化对农村养老问题的思考不足。为了更好应对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问题，需要扬弃这种静态老龄化分析方式，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去看待老龄化，在动态老龄化视角下重新审视农村养老。

（1）静态老龄化视角下的养老困境

首先，静态老龄化夸大了老龄化背景下养老问题的严重性。1951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男工人与男职员年满六十岁，一般工龄满二十五年，本企业工龄满五年者，可退职养老”，1996 年通过并于 2012 年由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我国将 60 岁作为老年人的年龄界限从建国到现在基本没有改变。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从建国初期的男性 39 岁、女性 42 岁上升到 2016 年的 76.34 岁，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也得到了极大改善。60 岁是否仍作为老年的年龄门槛值得商榷，如果这一年龄界线应该改变，或者说以弹性的身体状况来代替这种硬性的年龄规定，我国以目前统计口径统计的老年人数将大幅减少，养老压力也大为减轻。

其次，静态老龄化忽视了老年人面对生活的韧性。汉语语境里，养老既可以作为动词也可以作为名词。作为动词的养老指出了养老客体为老年人，省略的主体中也包含老年人自身；作为名词的养老在陈述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没有具体的量化指标，具有极大弹性。这种弹性包括两个方面：供养主体的弹性和供养客体的弹性。由于这种弹性的存在，只要养老的主客体双方达到一种均衡，养老活动便可以持续下去。总体而言，老年人对养老的态度是比较宽容的。

再次，静态老龄化将“老”视为一种威胁，对抗而非适应。尽管如今老龄化具有双重作用已经成为共识，其建设性与破坏性孰大孰小尚无定论。但传统的静态老龄化研究语境里，老龄化与消极联系在一起，对老龄化的第一反应是怎样去应对它，将其带来的损失最小化。事实上，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没有支持老龄化会阻碍经济发展的论断。将老龄化视为洪水猛兽一味去“堵”而不是去接受它，可能会适得其反。

^①彭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03):121-138+222-223.

(2) 动态老龄化视角下的养老出路

快速的老龄化进程对养老造成冲击,养老由此面对的困境不应该通过盲目加大对养老资源的供给来解决,而应该通过对老龄化问题的深入研究寻求解决之道。养老问题是养老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造成的,动态老龄化研究针对这两方面寻找养老出路。在养老资源的需求方面,动态老龄化强调对老龄化本身进行研究,从老年人自身状况与所处环境出发,了解某地老年人最低生活成本,确定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在养老资源的供给方面,动态老龄化强调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老年人在基本养老需求之上的养老诉求部分具有较大的弹性,这部分养老资源的供给也应该是弹性的。

动态老龄化通过对老龄化本身的研究,确定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继而通过对老龄化本质研究发现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养老资源的供给应该在确保老年人基本养老需求基础上,结合各地社会经济,给予老年人尽可能高的养老水平。

5.2.2 转变的路径：五大视野的扩展

静态老龄化视角无法应对发展中的老龄化现实,需要一种研究老龄化问题的新视角。在老龄化现实发展的同时,理论也在不断推进,但仍然无法解决老龄化下的问题。为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需要在对静态老龄化的扬弃中探索由静态老龄化向动态老龄化转变的路径。

(1) 更漫长的时间视野

站在某个历史节点看,老龄化是一个静态的事实;短期看,老龄化将呈现出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变动;长期看,老龄化将显现出其变动的全貌。在短期内,无法对老龄化的历史与发展趋势窥其全貌,无法把握其本质,也就无法对老龄化的应对提出根本的解决办法;由短期转向长期,可以发现我国当期的老龄化主要是由前期巨大的人口惯性和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引起的,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目前的老龄化只是整个老龄化进程的一小部分,正处于快速上升的老龄化阶段,未来当老龄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老龄化程度将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而后甚至将出现“逆老龄化”,老龄化发展趋势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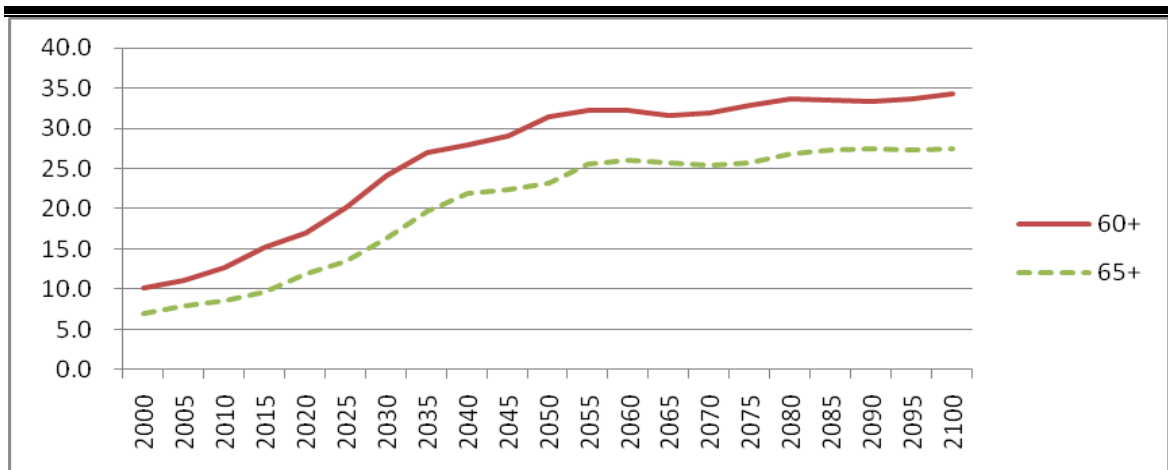
图 5-1 中国老年人口变化趋势百年预测^①

Fig.5-1 Centennial Prediction of the Changing Tendency of the Chinese Elderly Population

(2) 更广阔的空间视野

当前的老龄化研究多针对某一区域，由于地区间的人口迁移会导致老龄化程度的变动，某一特定地区的老龄化程度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可变的。这就导致对某个地区的老龄化研究往往与实际情况有所偏离，会高估或低估该地区的老龄化程度，需要以更大的空间视野去审视老龄化，按照城市——地区——国家——全球的空间扩展路径去放大我们的空间视野。由于地区间老龄化发展的不均衡，当不断放大我们看待老龄化的空间视野时，老龄化将得以中和。

(3) 更多元的学科视野

对老龄化的研究始于人口学，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发展，社会学、经济学等更多学科加入对老龄化的讨论中，各自以自身的学科视角对老龄化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以“老龄化程度”为核心，这是因为老龄化程度可以用数据度量，甚至老龄化的定义也与老龄化程度密切相关。

随着老年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当前所规定的 60 岁或 65 岁作为老年人的年龄界限的标准有必要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在越来越长寿的同时，老年人也相比历史上同年龄阶段的人变得更加健康，这也进一步冲击了“老龄化程度观”，老龄化程度观有必要向老龄化质量观转变，医学的进步和心理学的介入将有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进一步发展，更多学科加入“怎样使长寿的老年人更加健康”课题的探讨，将有利于老龄化

^①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2005,(06):92-95.

质量观念的传播。老龄化质量观更关注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健康是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首要指标，在老年人预期寿命一定的情况下，更长得健康老年生活时间则意味着更短的不健康的老年生活时间，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4）更多元的主体视野

对老龄化的研究多将老龄化视为一个研究主体，而将老龄化本身的过程视为一个“黑箱”，也有更深入的研究将目光聚集到老年人身上。老年人固然是老龄化最重要的部分，但由于人生命周期的连续性，当期的老年人就是前一期的年轻人，不仅要关注当前的老年人，也要关注未来的老年人——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作为准老年人的那部分中年人。一个简单的例子，当前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是其年轻时各种生活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年轻人推广宣传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以后的老年生活做健康储备，培养一个健康的长寿群体，减轻养老的负担。

（5）更宏大的社会变迁视野

目前的老龄化正在加速进行，与此同时我们所处的社会也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迁。我国的政治进程正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过渡，更强调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随着老年群体的扩大，其在社会中的话语权也将有所上升，将提出有利于老年群体的建议并推动向政策的转化；对老龄化的忧虑之一是其可能带来的过于庞大的养老需求无法满足，在老龄化发展的同时，老龄产业也在快速壮大。可以确信随着老龄产业的发展，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将得到满足，以后将面临的问题是怎样满足老年人更高层次的养老需求；社会对老年人的态度也更加宽容，尊老爱老一直是中华传统美德，老有所为也成为社会共识，未来社会对待老年人将更加平等，老年人将更好地进行社会参与，共享发展成果。老龄化也将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发展阶段，再也不会有人谈老龄化而色变。

5.2.3 转变的方向：三大方向

（1）从结果分析到过程分析

传统的老龄化分析将老龄化作为一个既定的结果，更注重去探讨在老龄化这个事实前提下所引发的后果及对策，而动态老龄化更注重分析老龄化本身，将老龄化视为一个过程，期望在对老龄化本身的分析中探求因其引发问题的解决之道。作为结果的老龄化向作为过程的老龄化分析思路的转变是对老龄化本质的更深层次的探讨。

(2) 从老龄化程度观到老龄化质量观

老龄化程度作为老龄化后续研究的指挥棒，一直牵动着老龄化研究者的神经，甚至对老龄化的原始恐惧正是源于这一老龄化观念。老龄化程度观在研究初期为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推动了老龄化研究。但它有个致命的缺陷——只反映了现象没有涉及到本质。对老龄化的最直接忧虑是它有可能会减少我国的人力资源，老龄化程度似乎与人力资源存量负相关。从老龄化质量观的角度看，这一命题并不成立，高质量的老年群体也蕴藏的巨大的人力资源，甚至足以抵消老龄化程度提高带来的人力资源减少。

(3) 从老年群体分析到个体分析

大规模个体的老化构成了整个群体的老化，整个人群中位年龄的上升就是人口老龄化的过程。老龄化研究最初是从老年个体着手，期望提供改善每个个体的身体状况来促进整体的健康，实现健康老龄化。随着理论与实践的推进，当前的老龄化研究重点关注整个老年群体。未来当整个老年群体不再作为社会的负担，可以做到老年群体的老有所养时，每个老年个体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求上升，关注重点必将从对老年群体转向每个老年个体的分析，最终实现对老年人个体的养老需求差异分析和针对每个老年人个体的养老资源精准化供给。

5.3 应对策略的转变

在老龄化的应对上，党俊武认为 30 年来中国老龄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即应对人口老龄化一以贯之，但研究视角发生了“老年人问题—结构性问题—社会形态—兴衰之道”的转变，反映了不同阶段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取向和理论基础的重要转变，即从问题研究（问题取向）到社会形态研究（理论取向）的转变，从解决问题到建构新的社会形态的转变^①。彭希哲、胡湛认为问题不在于人口老龄化本身，而是人类社会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学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从本质上讲，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问题更多地源于老化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社会架构的不协调所产生的矛盾，这使得现有的社会制度与公共政策无法满足老龄化社会的发展需求，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②。

^①党俊武.关于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理论基础的探讨[J].人口研究,2012,(03):62-67.

^②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03):121-138+222-223.

5.3.1 经验借鉴：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应对市场化

(1) 农村劳动力的乡城流动

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是农村社会对于市场化冲击的一种适应。市场化的不均衡发展使得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而在价格体系上城乡却是一致的，这使得农民在低收入的同时不得不承受与城市相同的医疗、教育开支水平，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首要因素。

表 5-1 2006-2015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Tab.5-1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from 2006 to 2015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015 年	31194.8	11421.7
2014 年	28843.8	10488.9
2013 年	26467.0	9429.6
2012 年	24564.7	7916.6
2011 年	21809.8	6977.3
2010 年	19109.4	5919.0
2009 年	17174.7	5153.2
2008 年	15780.8	4760.6
2007 年	13785.8	4140.4
2006 年	11759.5	3587.0

数据来源：《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①

(2) 养老观念的改变

女儿养老古已有之，传统乡村社会通过招赘婚姻确定女儿养老的正式身份，但这种关系建立在女儿一方的强势的基础之上，通常不被传统舆论所接受，因此仅仅是个别现象。传统的农村养老观念以“养儿防老”为核心，女儿通常不需要承担养老责任。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部分亲代与儿媳妇关系紧张，女儿养老作用凸显。现代女儿养老建立在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之上，将得以长期发张。

^①注：从 2013 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 年及以后数据来源于此项调查，与 2013 年前的统计口径略有不同。

传统的农村养老通过亲代与子代的“抚养-赡养”的双向反馈得以存续，而随着市场化冲击和子女数量的减少，子代的生存压力增大，赡养资源的提供不足以完全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老年人开始通过互惠模式来获取更多的养老资源，比如通过照顾留守的孙辈减轻子代压力的同时使子代可以在养老供给中投入更多的养老资源。

5.3.2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应对老龄化

当前的农村养老支持现实建立在传统农村养老支持的历史演绎与新中国成立后政策变迁下的农村养老支持演变基础上，从表 5-2 中可以看出，2011 年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已经比建国初期增加了 1300 多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由 7.3% 上升到 13.26%。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从第一次人口普查到第四次人口普查近 40 年时间里，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了 1.29%，而从四次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 20 时间里，这一比重上升了 4.67%，单位时间的上升速度加快了约 7 倍，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老龄化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此外，我国的老龄化还有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且发展速度更快，老龄化背景下的农村养老任重道远。

表 5-2 历次人口普查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据

Tab.5-2 The number of 60 or more elderly people from the population survey

全国人口普查年份	60 岁及以上老人（万）	占总人口比例（%）
1953 年第一次	4150	7.30
1964 年第二次	4230	6.10
1982 年第三次	7660	7.60
1990 年第四次	9740	8.59
2000 年第五次	12900	10.33
2011 年第六次	17800	13.26

数据来源：建国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1) 家庭养老支持为主

从经济来源、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各个角度来看，农村养老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化养老支持程度较低，家庭养老仍具有社会化养老无法替代的优势。研究发现家庭养老的老年人对晚年生活满意度更高，与子女分开居住的高龄老人精神赡养问题较

为突出，从老年心理学角度，心理孤独缺乏精神慰藉对老年人的伤害极大。^①

（2）农村社区养老支持困境

尽管我国农村社区养老支持的力量在不断壮大，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我国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欠发达地区农村村集体没有收入来源，无法建设农村养老设施，即使有政府少量拨款，也不得不投入到更紧迫的地方去。其次，政府对农村社区养老自上而下的推行工作缺失。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村地区虽然是基层自治组织，但政府依然对农村地区的重大事务的决策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推行农村地区社区养老的首要因素是资金，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这部分资金缺口较大，推行工作自然困难重重。最后，当前的农村地区养老大部分责任由家庭承担，并且能够承担，发展农村社区养老是在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决策，当前的紧迫性不足。

（3）政府开展多样化养老支持

政府通过规范“五保”制度，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等多样化举措来应对老龄化背景下越来越大的农村养老压力。

“五保”制度是一项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福利制度，现行五保政策从2006年开始实施，之后每年对供养标准做出调整。2016年将五保人员定为特困人员，规定五保供养对象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的老年人、残疾人和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供养标准在单一的基本生活标准基础上，增加了照料护理标准。供养方式分为机构集中供养和在家分散供养，可自行选择供养方式，鼓励具备自理能力的人员在家分散供养。《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供养资金在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由各省制定标准，有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的地方，可以从农村集体经营等收入中安排资金。2017年河南分散供养和集中供养的补助标准分别为3000元和4000元。符合条件的五保人员，不能同时享受低保政策。

^①李光勇.家庭养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地位及前途[J].人口学刊,2003,(01):28-33.

表 5-3 中国“五保”制度重要文件

Tab.5-3 The important case of "five guarantees" system

年份	相关文件
1956	《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958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1994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1997	《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
2006	《农村五保工作供养条例》

资料来源：宋士云.新中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变迁[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我国“五保”制度为农村最困难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当下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其运行存在一定问题：首先，“五保”供养人员多，近年来每年的供养人数稳定在 500 万以上，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对“五保”对象的甄别成为一项庞杂的工作；其次，“五保”供养资金以国家财政为主，集体保障和社会帮扶为辅，给国家财政尤其是地方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在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下矛盾突出。

表 5-4 2007-2015 年五保救助人数

Tab.5-4 The number of "five guarantees" system rescuers from 2007 to 2015

年份	集中供养五保人数(万人)	分散供养五保人数(万人)	供养总人数(万人)
2007 年	138	393.3	531.3
2008 年	155.6	393	548.6
2009 年	171.8	381.6	553.4
2010 年	177.4	378.9	556.3
2011 年	184.5	366.5	551
2012 年	185.3	360.3	545.6
2013 年	183.5	353.8	537.3
2014 年	174.3	354.8	529.1
2015 年	162.3	354.4	516.7

资料来源：2016 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 22-24 社会救助情况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 2007 年开始实行，是我国政府为了救助因多种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农村人口而实施的福利性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农村救助形式，如 2015 年我国农村救助总人口为 5484.1 万人，其中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 4903.6 万人，

农村特困人员（即原来的“五保”人员）供养 516.7 万人，传统救济 63.8 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着较广的覆盖面；救济水平来看，2015 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年均支出 1766.5 元，农村特困人员。农村生活保障的对象为农村贫困人员年均支出 4000 元左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绝大部分为农村老年人口，因此其对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意义重大。

表 5-5 2008-2013 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情况

Tab.5-5 Rural minimum life security situation from 2008 to 2013

年份	农村低保人数(万人)	政府对农村低保的财政支出 (亿元)	农村低保平均标准 (人/月)
2008	4283.3	222.3	82.3
2009	4760.0	363.0	100.8
2010	5214.0	445.0	117.0
2011	5305.7	667.7	143.2
2012	5344.5	718.0	172.3
2013	5382.1	841.9	195.6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2014 年 2 月，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项制度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机结合，是在两种制度的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统一。首先在制度名称上，原先的两种制度被统一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养老保险制度中首次打破城乡二元制，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其次缴费标准的统一，合并前新农保缴费可以选择的档次少、缴费标准低，无法满足农村居民多样化的投保需求，制度统一后增加了缴费档次，扩大了缴费人群。最后管理服务的统一使得管理水平和效率大大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建立统一的城乡社保制度意义重大。^①

（4）市场化养老进展缓慢

农村市场化养老力量主要包括商业保险机构和营利性的养老机构。尽管这两种事物在农村已经存在了较长时间，但由于农村地区商业保险意识的缺乏，商业养老保险开展并不顺利，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农村地区老年人及其家庭对社会养老也较为排斥，认为老人入住社会化养老机构违背了传统的孝道要求。这一点也使得一些地区的

^①马雪.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D].辽宁大学,2014.

社会化养老机构的群众基础不足，从而经费来源单一无保障，约束了市场化养老机构的发展，形成了“客源少经费不足、经费不足则条件难以改善、条件较差则愿意入住的人更少”这样的恶性循环。^①养老活动的市场供给是依靠价格机制调节的供给方式，它是自发形成的，以价格为调节杠杆，商业养老保险和营利性养老机构均是依据市场价格提供养老资源的，对于农村居民晚年生活的自我保障无疑是一个较佳的替代选择，然而受农村社会文化与传统观念、社会经济环境与经济机制、保险市场开发成本、保险人服务质量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市场化养老资源的供给非常有限。^②

5.4 本章小结

老龄化研究理论的转变一直在进行中，从排斥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健康老龄化、产出性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理论推进中，每一阶段的老龄化理论都与其所处阶段的老龄化现实紧密相连。当前的快速老龄化现实与僵化的静态老龄化分析框架之间的矛盾使得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因此需要一种新的老龄化理论去适应当前的老龄化现实，动态老龄化理论应时而生。通过五大视野的扩展和三大方向的转变构建动态老龄化分析框架，用适应而非对抗的角度去看待快速老龄化引起的问题并寻求其解决之道。通过借鉴农村养老系统对市场化冲击的应对，寻找老龄化下的农村养老支持的现实出路。

①戴稳胜.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2015,(09):174-175.

②刘春梅.农村养老资源供给及模式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3.

第六章 动态老龄化视角下的系统调适

6.1 调适的基础：动态系统论

6.1.1 动态老龄化的核心观点

(1) 不同时代的老年人有不同特征

不同时代的老年人由于生活环境、时代背景的不同，其群体拥有的老年特征是不同的，其应对老年生活的思路也是不同的。如调研中当前的老年人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的全民福利时期，对政府养老支持的信任度较高，而未来的老年人将更乐意从市场交换中获取养老服务。

(2) 老龄化与社会结构变迁相关联

人口老龄化发展往往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突出表现在对老年人界定的年龄标准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均寿命不断延长，老年的年龄标准也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如政府通过划定退休的具体年龄，以决定退休者能否享受到完整的社会保障待遇，从而使人们预期进入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不断变化。

与此同时，老年价值观也在发生着变化。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互动创造了老年这一概念，同时这个概念也伴随着社会互动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与之相适应的老年价值观也在不断变化。动态老龄化认为老年群体的工作能力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会随着老年群体不断更新换代而变化。当前老年人的工作能力，与十年后迈入老年门槛的老年人的工作能力，势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

(3) 老龄化具有马太效应

老年群体的马太效应认为社会变迁对老年群体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是集聚性的。随着老年群体的壮大，将拥有更多发言权，能够通过各种媒体渠道，改变社会成员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同时通过合法的政治渠道将老年群体诉求上升为国家行为，从而在物质保障与精神生活方面强化其优势地位。

6.1.2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特征

(1) 系统动态性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是动态的,随着时代变迁在不断自我调整。在传统养老支持中,作为地方精英乡绅曾在国家与个体家庭之间发挥着纽带作用,是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中重要环节。但随着时代发展,乡绅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养老支持系统通过调整,村集体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乡绅。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从缺失乡绅这一环节到村集体的加入,实现了新的平衡。

(2) 系统适应性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与农民的较低的养老期待密切相关。历史上农民长期生活在生产力低下与剥削导致的贫困之中,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对农民而言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也养成了农民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心态,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活法。在养老方面则具体体现在农村养老有着巨大的弹性,不存在一个硬性标准。当养老支持系统不足以提供较多的养老资源时,只要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农村老年人可以通过压缩生活开支使生活继续下去。老年人这种较强的生活韧性使得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3) 系统稳定性

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一种动态稳定,系统稳定性的根源在于传统养老支持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养老文化。养老文化首先会对家庭养老中子女的养老责任进行约束,在乡村熟人社会,孝养父母是一种天然的乡规民约,践行这一规则一方面是子女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另一方面会得到外部的认可;对这一规则的背离会受到外部强大的舆论压力,甚至需要背井离乡。养老文化发挥作用还体现在国家对养老的支持,家国一体的文化形态使得在“家”需要对“国”尽义务的同时“国”需要维护“家”,对个体家庭养老的重视也包括在内,因此尽管我国政府对农村养老的支持力度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异,但从未缺位。

6.2 养老支持系统供给侧调适

6.2.1 非正式支持核心转变

在构建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供给侧中,非正式养老支持的核心是家庭。随着老年个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家庭结构的不断变化,老年人个人将取代家庭成为这一子系统的核心。

老年人的个体自我养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老年人有自我养老的能力。一般来说，老年人自立能力越强，其对外界的依赖越少，越倾向于选择自我养老；二是老年人的意愿。老年人在能够维持自己的正常生活的前提下，一般都是自食其力，不愿依靠他人帮助而生活，即使生活上有些不方便，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一般不会和子女诉说，而是自己努力克服和解决。^①农村养老由被动的自我养老向主动的自我养老转变与老年人的自我评价与外部评价密切相关。

通过对 N 村 19 名 60 岁以上老人和 32 名 45-60 岁即将迈入老龄的中年人的调查，整理数据得出表 6-1、6-2、6-3、6-4。

表 6-1 60 岁以上老年人非正式养老支持来源

Tab.6-1 60 or more elderly people non-formal recruitment support source

遇事求助的人员（可多选）	人数	比例（%）
自己与配偶	12	63.16
兄弟姐妹	5	26.32
兄弟姐妹的配偶	2	10.53
子女	16	84.21
子女配偶	10	52.63
其他亲戚	4	21.05
朋友	3	15.79
邻居	8	42.11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数据整理

表 6-2 45-60 岁老年人非正式养老支持意愿

Tab.6-2 The aged wishes of non-formal recruitment support from 45 to 60

遇事求助的人员（可多选）	人数	比例（%）
自己与配偶	45	86.54
兄弟姐妹	9	17.31
兄弟姐妹的配偶	5	9.62
子女	40	76.92
子女配偶	35	67.31
其他亲戚	9	17.31
朋友	6	11.54
邻居	17	32.69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数据整理

^①陈芳,方长春.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出路:欠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模式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4,(01):99-106.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在非正式养老支持方面,未来的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支持意愿有所下降,自己与配偶支持意愿大幅上升。在访谈中大多数中年人表示养老归根结底是自己的事情,子女压力也比较中,能不麻烦子女尽量不麻烦子女。

6.2.2 正式支持核心转变

政府长期以来都是正式养老支持的核心。政府与市场都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边界来适应新的老龄化形势,通过市场的力量而非政府强制干预来应对老龄化将逐渐成为共识。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养老支持中的政府主导将回归政府兜底的作用,正式支持的核心将由农村社区接棒。

表 6-3 60 岁以上老年人正式养老支持来源

Tab.6-3 60 or more elderly people formal recruitment support source

遇事求助的人员 (可多选)	人数	比例 (%)
村委会	1	5.26
政府	10	52.63
其他	2	10.53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数据整理

表 6-4 45-60 岁老年人正式养老支持意愿

Tab.6-4 The aged wishes of formal recruitment support from 45 to 60

遇事求助的人员 (可多选)	人数	比例 (%)
村委会	10	19.23
政府	10	19.23
其他	15	28.85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数据整理

在正式支持方面,未来的老年人认为上级政府能够给予的最大帮助是保障最基本的生活水平,而他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生活的温饱,有了更多样化的需求。这些需求尽量能在自己熟悉的社区环境中满足,他们认为未来的农村社区互助养老将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

6.3 养老支持系统需求侧调适

6.3.1 信息资源的双向流动

初步构建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中养老资源的流动是从供给侧到需求侧的单向流动。即养老资源市场是一个供方市场,作为买方的老年人是没有话语权的,供给方提

供什么样的养老资源，只能被动接受。在动态老龄化理论框架中，农村养老支持的核心从原先的家庭与政府转变为老年人个人和市场，随着老年人话语权的不断扩大，其在养老市场中将把握更多主动权，通过自己养老意愿的传递来影响养老资源供给侧。

6.3.2 老年群体的异质性

老年群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老年群体成员的组成，会随着成员的去世与新成员的不断补充，而得以持续性更新。新进的老年人与去世的老年人之间，无论是在个体还是群体方面，均具有较高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源于老年个体的差异性、社会、经济等外在客观条件的变迁共同影响，具体表现在不同出生批次的老年人，在老龄化的过程中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老化模式。老年群体的异质性并非说明人口老龄化是不可知的，每个老年个体的老化过程并非完全独一无二的。因此，研究农村养老支持系统中老年人，要注意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发展与变迁对老年群体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导致老年群体间异质性特征的重要原因，同时要从群体分层的角度去看待老年群体。

6.4 新的平衡

运用动态老龄化理论对农村养老支持系统进行调适，在养老支持供给侧，非正式支持核心由家庭转变为老年人个人，正式支持系统的核心由政府转变为市场，而在养老资源与信息的流动方面，养老资源由供给侧流向需求侧，同时养老需求侧将养老意愿反向传递给养老供给侧，在双向流动中实现养老效用的最大化。

经过调适后新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达到平衡，结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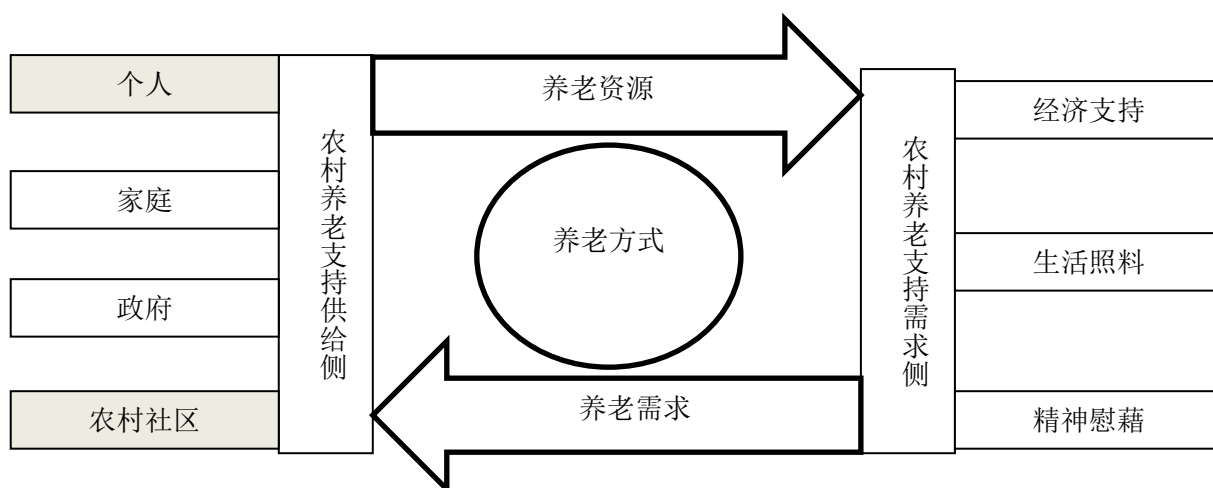


图 6-1 动态老龄化调适下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

Fig.6-1 Rural pension support system under the dynamic aging adjusted

6.5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通过对动态老龄化的核心观点和农村养老支持系统的特征进行系统阐述,在此基础上通过动态老龄化分析视角下去探讨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如何通过调适实现其可持续性。农村老年人自我意识的增强以及农村家庭养老的弱化使得非正式支持养老系统的核心由家庭向老年人自身转变,农村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政府定位的不断明晰使得正式支持养老系统的核心由单一由政府核心向市场提供服务为核心转变。在需求侧,随着农村老年人的不断增多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老年市场不断扩大,老年人将最终成为这一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老年人的养老意愿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在供需双方的不断博弈中,农村养老支持系统最终实现新的平衡,农村养老支持继续平稳运行。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养老作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自产生之日起就注定与人类历史紧密相连，必将长期存在。而“农村”作为一种人类聚落形态，具有历史性。探讨农村养老是否将长期存在，必须先将“农村”一分为二为两种形态：行政区划上的农村概念与生活方式上的农村概念。显而易见，行政区划上的农村概念生命是脆弱短暂的，可能随着一纸政令原先的农村地区被划归为城市地区，这一层面上的农村概念结束，农村养老即随之消亡。而生活方式上的农村概念将在更长时间范围内存在，熟人社会的相处模式与孝养结合的养老方式会在一定条件下爆发巨大生命力，这一层面的农村养老将伴随人类历史。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构建动态老龄化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是对已有理论的批评继承而非否定。在这一框架内，老龄化相关要素都是在动态变化的，无论是老年人自身，还是外界对老年人的看法，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更新。已经产生的种种所谓老龄化问题的实质是已经变化的社会运行结构和陈旧的老齡思维及其相关的工作方式之间的“不适应”，社会结构的向前运动是不可逆的，动态看待老龄化，以一种“适应”而非“问题”视角去对待老龄化与时代发展间产生的摩擦。在社会转型影响老龄化的同时老龄化也在重新塑造世界，同时未来也将会不断有新的老龄化理论产生去“适应”新的时代。

回到研究开始提出的问题，农村养老何以持续千年？那是因为农村养老支持持续运行的背后有一个复杂的养老支持系统，这一系统的坚韧性与自适性使其可以在内外条件变化时不断调整自身，保障了农村养老的平稳运行。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在快速老龄化背景下是否会继续发挥作用？答案是肯定的。农村养老支持系统已经稳定运行了数千年，在现代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冲击，在面对冲击中通过自身结构调适，实现了平稳过渡。快速老龄化也只是新一轮对农村养老支持的冲击，通过系统调适，将解决老龄化转变为适应老龄化的思路，将社会化的老龄化内化为农村养老的一个组成部分，农村养老支持会继续存在下去。

农村养老最终会选择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从社会化养老产生便成了一个争论

不休的话题。随着我国家庭不断小型化，社会化养老的主张一度占得上风。对于社会化养老内部也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政府与市场，谁社会化养老的主角？无论是家庭和社会的争论还是政府与市场的分歧，都不应该忽视家庭作为历史上长期的养老载体，至今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家庭养老仍是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家庭作为一种成本较小的组织形态，将在长期内发挥着最主要的养老作用。

在未来的老龄化社会中，对老年人自身的研究关注度必定上升，对老年群体的分层研究尤为重要。研究养老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老年人？可以按年龄、身体状况等诸多标准划分，各种标准又该怎样细化。其次，老年群体内部怎样划分？按年龄分为准老年人、低龄老年人、高龄老年人与超高龄老年人，按居住的可分为农村老年人、小城镇老年人、城市老年人，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划分方法。对老年群体的细分将为老龄社会中老龄工作的精细化展开提供理论支持。

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深刻影响着农村养老：交通条件的改善创造了更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网络的发展缩小了城乡间的信息差距，技术进步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未来智能养老的美好图景。但是，养老的根本是人，过分依赖技术而忽视了人这个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核心，养老质量必然大打折扣。技术可以作为养老的补充，但养老最终还是需要回归到人本身。

参考文献

图书类:

- [1](美)费正清,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7-19.
- [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1.
- [3]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M],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0:56.
- [4]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32.
- [5]李捷枚.中国农村养老模式变革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5:15.
- [6]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编审.新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1140-1141.
- [7]吴晓林.中国五保养老保障研究:制度沿革、权利保护与策略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
- [8]邹进泰.张爱虎编著.激荡百年大国农业 1912-2012[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98.
- [9]杜乃涛.农村经济问题探索[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214.
- [10](美)波普诺,李强等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3.
- [11]吴松弟,中国人口史 第三卷 辽宋金元时期[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55.

期刊类:

- [1]姚远,陈昀.老龄问题群体分析视角理论框架构建研究[J].人口研究,2013,(02):73-82.
- [2]姚远.重视非正式支持,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J].人口与经济,2002,(05):45-48+26.
- [3]路瑜.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城市郊区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研究[D].南开大学,2014.
- [4]肖水源,杨德森.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87,(04):183-187.
- [5]Sarason LG.et al. A technical report. Washington D. C.: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81.
- [6]Andrews GC. et al. Life event stress,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and risk of psychological impairment. J New Ment Dis,1978. 166:29.
- [7]Henderson S.et al. Neurosis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sted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9-52.
- [8]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02):98-100.
- [9]郑杭生,洪大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涵[J].社会学研究,1996,(01):58-63.
- [10]李强.社会支持与个体心理健康[J].天津社会科学,1998,(01):66-69.
- [11]丘海雄,陈健民,任焰.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J].社会学研究,1998,(04):33-39.
- [12]张文宏,阮丹青.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J].社会学研究,1999,(03):14-19+22-26.

- [13]李培林.社会生活支持网络: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J].江苏社会科学,2001,(01):53-55.
- [14]刘慧君,李树苗.中国社会转型下的心理福利与社会支持[J].公共管理学报,2012,9(02):42-51+124.
- [15]钱再见.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政策[J].江海学刊,2002,(03):97-103.
- [16]张友琴.社会支持与社会支持网——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工作模式初探[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94-100+107.
- [17]张敏.社会支持网络研究——对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7,(12):48-57+171-172.
- [18]秦俭.农村独居老人养老困境及其化解之道——以社会支持网络理论为分析视角[J].湖南社会科学,2013,(03):109-112.
- [19]杨雄.弱势青少年生存状况与社会支持[J].社会科学,2004,(05):64-73.
- [20]唐晓容.孤残儿童“类家长”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以南方 X 福利院内 12 个“类家庭”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4,(08):145-148.
- [21]丘海雄,陈健民,任焰.社会支持结构的转变:从一元到多元[J].社会学研究,1998,(04):33-39.
- [22]韦璞.贫困少数民族山区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网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J].南方人口,2007,(01):45-50.
- [23]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1,(01):76-82.
- [24]沈苏燕.农民养老保障的政策优化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1.
- [25]周新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改革与战略,2017,33(10):66-76.
- [26]郭丽萍.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家庭状况的变化[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01):98-99.
- [27]阮丹青,周路,布劳,魏昂德.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兼与美国社会网比较[J].中国社会科学,1990,02:157-176.
- [28]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02):77-89+206.
- [29]马红鸽.城市郊区农村居民家庭养老支持力系统的构建:以西安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6):136-142.
- [30]陈彩霞,陈功.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对农村养老的影响[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1):171-176.
- [31]郭昕.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的新问题[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65-67.
- [32]潘剑锋.论孝道在我国农村养老中功能弱化的原因及其防范对策[J].湖南社会科学,2009,(03):59-62.
- [33]陈少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陷与政府责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4,(04):35-41.

[34]李建新,于学军,王广州,刘鸿雁.中国农村养老意愿和养老方式的研究[J].人口与经济,2004,(05):7-12+39.

[35]吴晓东.中国农村养老供给的困境与出路[J].社会科学研究,2004,(01):103-106.

[36]陈皆明.中国养老模式:传统文化、家庭边界和代际关系[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6):44-50+61.

[37]秦红增.农村土地养老支持力的村域比较[J].学术论坛,2010,(04):98-102.

[38]张丹.社区差异视角下的养老支持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4,(12):64-65.

[39]张康.新时期城市养老浅析[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8):80-81.

[40]周湘莲,刘英.论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养老的政府责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04):54-60.

[41]原新.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从人口学视角的分析[J].人口研究,2004,(05):48-54.

[42]张岩,徐俊.农村空巢老人“孤独死”现象分析及对策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9):61-64.

[43]王胜利,柯玲.农村回族养老支持网络分析——以宁夏南部山区为例[J].社科纵横,2015,(03):117-121.

[44]徐勤.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调查[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01):5-10.

[45]王国军.中国计生家庭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与城乡统筹[J].中州学刊,2009,(01):106-111.

[46]佟新.我国的老龄化、性别和养老政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82-89.

[47]黄闯.农村老人自我养老保障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探索,2015,(02):125-129.

[48]朱劲松.试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自我养老模式选择[J].农村经济,2009,(08):79-81.

[49]李俏,陈健.农村自我养老的研究进路与类型诠释:一个文献综述[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1):1-7.

[50]王冬桂.社会转型中的农村新型养老模型建构[D].山东大学,2007.

[51]杜鹏.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与养老服务的发展[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5,(07):27-28.

[52]慈勤英.家庭养老方式选择的性别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00,(02):29-32.

[53]郭志刚.中国老年妇女户居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1996,(05):45-53.

[54]柳玉芝,周云,郑真真.农村不同年龄人群养老观念的比较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4,(S1):150-153+179.

[55]郭志刚,刘鹏.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需求满足方式的因素分析——来自核心家人构成的影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3):71-80.

[56]谭樱芳.社区养老——城镇养老服务保障的新选择[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87-89.

- [57] 阎安.论社区居家养老:中国城市养老模式的新选择[J].科学经济社会,2007,(02):86-89+93.
- [58] 李学斌.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研究综述[J].宁夏社会科学,2008,(01):42-46.
- [59] 易松国,鄢盛明.养老院老人与居家老人健康状况比较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03):73-79+96.
- [60] 刘岚,陈功,郑晓琰.我国社会化养老机构未来发展策略[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8,(04):412-414.
- [61] 张冉,范子文.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的需求分析——基于北京市的相关调查数据[J].技术经济,2009,(09):88-94.
- [62] 张晓青.以房养老模式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07,(11):78-79.
- [63] 朱劲松.中国开展“以房养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1,(02):78-82.
- [64] 房睿.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需求的经济学分析[J].当代经济,2009,(10):6-7.
- [65] 党俊武.关于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理论基础的探讨[J].人口研究,2012,(03):62-67.
- [66] 陈芳.从“家庭供养”到“经济自给”:经济欠发达农村老年人经济供养方式的转变[J].人口与社会,2014,(03):76-80.
- [67] 阳杨,袁亚运.社会网络视角下广场舞群体的养老支持研究——来自成都市调查数据[J].社会保障研究,2016,(02):36-44.
- [68] 黄琳,武亚雄.论家国同构、二元结构和市民社会——农民主体性发展困境的出路[J].中华文化论坛,2007,(02):132-136.
- [69] 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03):7-16.
- [70] 孙兵.人口、盛世与民生:对于清前期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2):245-250.
- [71] 郑军.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中政府责任的理论框架:基于制度文化的视角[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10):99-107.
- [72] 姚远.非正式支持理论与研究综述[J].中国人口科学,2003,(01):69-74.
- [73] 陈述.循序推进与重点突破:从轨迹看改革理论传承[J].改革,2013,(10):13-22.
- [74] 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05):3-29.
- [75] 陈明华,郝国彩.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分解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04):136-141.
- [76] 杜鹏,王武林.论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的转变[J].人口研究,2010,(02):3-10.
- [77] 杜鹏.人口老龄化研究的进展[J].中国人口科学,1999,(04):57-58.
- [78] 庞丽华,Scott Rozelle,Alan de Brauw.中国农村老人的劳动供给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3,(02):721-730.
- [79] 彭希哲,胡湛.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1,(03):121-138+222-223.

- [80]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2005,(06):92-95.
- [81]谷玉良.农村人口外流与农村养老困境[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114-122.
- [82]丁玉龙.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城乡收入差距[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104-113.
- [83]夏辛萍.光环还是枷锁——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女性老年照顾者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24):6266-6268.
- [84]王辉.农村养老中正式支持何以连带非正式支持?——基于川北S村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证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7,(12):68-73+95.
- [85]陈妮娅.社会参与对中老年人成功老龄化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7,(23):5962-5964.
- [86]李海明,李晓阳.人口老龄化与长期人均收入演进[J].贵州社会科学,2017,(12):117-124.
- [87]童玉芬,廖宇航.健康状况对中国老年人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17,(06):105-116+128.
- [88]赵向红,王小凤,李俏.中国养老政策的演进与绩效[J].青海社会科学,2017,(06):162-167.
- [89]杨静慧.欠发达地区农村空巢家庭养老的困境与应对——兼论互助式养老的综合效益[J].甘肃社会科学,2017,(06):177-181.
- [90]曹莽.当今老龄化:沿革、趋势与新界定[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6):100-107.
- [91]李乐乐.我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6):94-102+151.
- [92]印子.优势视角下农村养老需要及其自组织满足[J].中州学刊,2017,(09):79-84.
- [93]班涛.农村养老的区域差异研究[J].社会科学研究,2017,(05):142-149.
- [94]李树茁,徐洁,左冬梅,曾卫红.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科学,2017,(04):1-10+124.
- [95]苏燕华,刘丽丽.从留守老人故土情结看当前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J].农业经济,2017,(05):73-74.
- [96]郑自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孝文化传承探讨[J].伦理学研究,2017,(03):110-114.
- [97]钟涨宝,杨威.原生家庭偏好、现代性与农村女儿家庭养老——基于湖北省红安县的实证分析[J].学习与实践,2017,(04):115-125.
- [98]李俏,陈健.变动中的养老空间与社会边界——基于农村养老方式转换的考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2):128-136.
- [99]蒋军成.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演进与发展趋势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2):67-77.
- [100]申喜连,张云.农村精神养老的困境及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2017,(01):109-113.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1. 发表的学术论文

- [1]Wang Hongwei.The Change of Perspectives on Aging Research: From Static to Dynamic [J].International Core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 Engineering Index,2017,Vol.7,No.3:60-62.
- [2]王洪围.二元制背景下城乡养老的现状与未来[J].中国集体经济.2017,Vol.33,No.36:125-126.

2. 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1]我国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实施条件及影响研究,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编号:16KY0318),第二完成人,2016年5月-2017年5月.
- [2]禁摩限电综合效果分析,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第八届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2016年6月.
- [3]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问题研究,“华为杯”第十三届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2016年11月.

致谢

时光匆匆，随着论文工作接近尾声，研究生生涯也即将结束。将近三年的时光，不仅学习到一个崭新领域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环境里对于自我性格的不断塑造和视野的不断开阔，感恩在工程大的种种。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曾瑞明老师，感谢老师在学习上和生活上给予我的引导与帮助。曾老师学术上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生活中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与谦逊随和的生活态度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祝福老师能快快乐乐地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行。

然后要感谢陪伴三年的同窗好友，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上，你们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包容，你们给我的研究生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愿诸位前程似锦，得己所愿。

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你们是我物质上和精神上最坚实的后盾，正是你们的辛勤劳作才换来了我读研的机会。愿你们平安健康。

最后要感谢所有为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前进做出努力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起步晚，其不断完善既需要胸怀天下、经世济民的理想主义者，也需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实干者，中国社会保障事业任重道远。相信“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终会实现。

王洪围

2018年3月

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